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三十期
2020年4月，頁141-187
國立台灣文學館

「言文『不』一致」的起點
——重論張我軍〈新文學運動的意義〉及其時代*

呂美親
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摘要

劉捷在1936年發表的〈臺灣文學の史的考察〉一文中，曾列舉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黃朝琴〈漢文改革論〉、蔡培火〈新臺灣の建設と羅馬字〉、張梗〈討論舊小説的改革問題〉、連溫卿〈將來之臺灣話〉、張我軍〈新文學運動的意義〉六篇文章，謂為1920年代初期台灣新文學運動相關的「導火線文章」。本論文以這六篇文章作為討論中心，嘗試論析台灣新文學運動初期，不同背景的知識分子們對於台灣新文學的主張與實際的語文改革提案，並重新定義它們在台灣新文學運動開展初期中的位置。尤其藉著張我軍的〈新文學運動的意義〉以外的五篇文章之討論，來論析張我軍在此文中提起的兩項要點：「白話文學的建設、台灣語言的改造」，究竟如何在日後的台灣新文學運動之場域中被討論、實踐，以及因此所產生在台灣新文學當中的文學、語言及文字的問題。

關鍵詞：言文一致、台灣新文學運動、張我軍、新書面語、新口語

* 本論文初稿宣讀於「朝向台灣『新文學』：2019台灣文學學會年度學術研討會」（新竹：台灣文學年會、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主辦，2019.10.19），會議中幸得主持人黃美娥教授的寶貴提問與建議，且承蒙學報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諸多寶貴的修改意見，特此致謝。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Tiunn Ngóo-kun's "The Significance of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and that Epoch

Lī Bí-Chhin

Contra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article "Historic Observation of Taiwan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1936, Lâu Tsia̍t(Liu Chieh) listed six articles: "New Mission of Popularizing Vernacular Literature" by N̂g Thîng-tshong(Huang Cheng-Chung), "Chinese Reformatory Theory" by N̂g Tiâu-khîm(Huang Chao-Ch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aiwan and Church Romanization" by Tshuà Puê-hué(Tsai Pei-Huo), "Discussing the Reform of Old Novels" by Tiunn Kíng(Jang Geng), "Taiwanese in the Future" by Liân Un-khing(Lian Wen-Ching),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by Tiunn Ngóo-kun(-Jang Wo-Jiun). These are called "Fuse Articles" and they are related to the Taiwan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in the early 1920s.

The six articles are at the center of discussion as the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claims on Taiwan New Literature and actual language reform proposals by intellectual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in the early phase of Taiwan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and redefining their position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Taiwan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Thus,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five articles by Tiunn Ngóo-kun(Jang Wo-Jiun) apart from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I will analyze the two main points mentioned by Tiunn Ngóo-kun(Jang Wo-Jiun) in the article "Construction of Vernacular Literature,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ese Language" in order to reveal how

it is later discussed and practiced in the field of the Taiwan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and also highlight the issues of literature, language and writing in Taiwan New Literature.

Keywords: *Genbunitichi*, Taiwan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Tiunn Ngóo-kun(Jang Wo-Jiun), New Written Language, New Spoken Language

「言文『不』一致」的起點
——重論張我軍〈新文學運動的意義〉及其時代

一、前言：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導火線」

關於新舊文學論爭的考察，目前最完整的論著當屬翁聖峰的《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1] 此書鉅細靡遺地搜羅於日本時代發行的所有新聞、雜誌、期刊，將所有新舊文學相關的討論一一整理，且將1920年代以降至1940年的新舊文學論爭加以分期，並歸納各時期因應不同背景與思考所發表的文章之主旨，再給予評述及定位。以往論及新舊文學論爭，多只談及1920年代初期的討論，而根據此書的考察，論爭事實上是延續至1940年。且即便受限於種種因素，使論爭停止，但新舊的意義與台灣文學的走向，仍一直被思索著。此書提供了一個理解新文學運動一個更全面的視野與更多關於政治、文化、認同、語言、族群等思考方向。不過，關於新文學運動初期的各家之言，尤其是針對新文學運動的內涵之討論，實仍有待更多不同視野的細緻討論。例如，劉捷在1936年發表的〈臺灣文學の史的考察〉一文中曾列舉六篇文章，謂為1920年代初期台灣新文學運動相關的「導火線」文章。這六篇文章包括：

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1923）
黃朝琴〈漢文改革論〉（1923）
蔡培火〈新臺灣の建設と羅馬字〉（1923）
張梗〈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1924）
連溫卿〈將來之臺灣話〉（1924）
張我軍〈新文學運動的意義〉（1925）。[2]

新文學運動的重要論述當然還有其他，但劉捷列此六篇，想必有其欲呈現

1 翁聖峰，《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7.01）。
2 劉捷，〈臺灣文學の史的考察〉（一），《臺灣時報》197號，1936.04.01，頁87。篇名後的發表時間與新式標點符號為引用者所加。

運動初期乃有諸多不同背景與關懷面向各異的諸多知識分子參與之意涵，以及其在時間意義上的觀察與見解。[3] 這些文章的宗旨，包含了以「白話文」書寫來「改革漢文」的提倡、以「羅馬字」書寫台灣話作為快速普及教育與知識的意見，或者將來以漢字做為新時代書寫文字時，台灣話的近代工程可先從哪些基礎環節著手，以及新文學運動的文體走向等諸多建議。

其中，留學日本、引入日本「言文一致運動」所寫成的黃呈聰與黃朝琴兩篇，被稱為「**開台灣白話文運動之先河**[4]」的文章；尤其這兩篇文章都明確提倡以「**言文一致體**[5]」的文體來寫作台灣的白話文；而這也是台灣的日本留學生對於日本在1920年代前後透過近代文學實踐的過程中，所成就的言文一致運動之呼應，以及將此運動帶回殖民地台灣的具體迴響。而廖毓文亦將此後至1933年為止大約10年的一連串討論，通稱為台灣的「**文字改革運動**」[6]。因

---

3 新文學運動初期，於《臺灣》、《臺灣青年》、《臺灣民報》所刊出的關於文學及語文改革的文章相當多，但劉捷於〈臺灣文學の史的考察〉一文中列出此六篇，當有其作為文學評論家以「史學」式考察的衡量。舉例而言，筆者收藏的劉捷於1936年出刊卻隨即被禁的《臺灣文化の展望》一書之影印本，雖影印本未有版權頁，但從自序可知此書與已故《新高新報》記者江賜金合著，而社會運動方面主筆者應為江氏；自序所押日期為該年2月，即〈臺灣文學の史的考察〉刊出前2個月；雖著作時間相近，但書中的**第三編「台灣文學論」**乃收錄〈新文学運動の批判〉、〈臺湾文学に関する書〉、〈臺湾文学鳥瞰〉、〈民間文学の整理及びその方法論〉四篇。雖此書未收〈臺灣文學の史的考察〉一文，但其中〈台湾文学鳥瞰〉（1934.11、1935.03）、〈民間文学の整理及びその方法論〉（1935.07）二篇，皆曾刊於《臺灣文藝》。對照內文，或可推測：於《臺灣時報》連載3回〈臺灣文學の史的考察〉，應是在書出版後就台灣文學議題所改寫的文章。而雖〈臺湾文学鳥瞰〉之論述文脈與〈臺灣文學の史的考察〉有所出入，但它以出版順序先後論及**《臺灣》及《臺灣青年》**中重要文章時，先提及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黃朝琴〈漢文改革論〉及張洪南〈誤解されたローマ字〉（該書頁195-196）等文。而後再介紹**《臺灣民報》**，並舉出蔡培火〈新臺灣の建設と羅馬字〉、張梗〈討論舊小説的改革問題〉、連溫卿〈將來之臺灣話〉、張我軍〈新文學運動的意義〉，以及懶雲〈無題〉等篇（該書頁197）；並説明「**自此之後**」，一些人開始發表關於台灣文學的改革意見，如《臺灣日日新報》上可見幾篇交鋒的議論，而中國新文學的介紹也愈來愈多，包括胡適、魯迅、郭沫若等人的文章。也就是説，劉捷在稍後撰寫的〈臺灣文學の史的考察〉中所揭舉的六篇文章，有作者在時間點或各家觀點上的取決考量。因此，就此篇從「歷史性」的考察之文所舉的六篇文章，來進行聚焦分析，應具作為例證的參考意義。

4 《台北市志　卷首下　大事記》於1923年2月2日一則記「黃呈聰、黃朝琴為推行台灣文化運動、普及白話文，在《臺灣》雜誌發表：〈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及〈漢文改革論〉，『**開台灣白話文運動之先河**』」（台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1989.06），頁125。

5 「言文一致體」：從古典舊文體改作為白話文體的初期文體，較半文半白更加白話，兼具書面與口語功能之白話文之文體。參考飛田良文編，《国語論究第11集　言文一致運動》（日本東京：明治書院，2004.06），頁14-16。

6 廖毓文將此後一連串的討論通稱為「**台灣文字改革**」；謂：「自民國11年起，至民國22年止，十年來之間，發生了一連串的**文字改革運動**，有的提倡『白話文』，有的提倡『羅馬字』，有的提倡『台灣話文』，甚至也有人提倡過『世界語』，各人的主張都不一致，但其企圖，都是一樣想在異族的支配下，使全省民（當時稱台灣人），獲一識字的利器，以吸收新智識，新思想。」廖毓文著，〈台灣文字改革運動史略〉，《台北文物》3卷3期、4卷1期（1954.12.10、1955.05.05）；轉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5・文獻資料選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03），頁459。

此，從台灣新文學運動在開展初時的幾篇代表文章亦可知，文學近代化、文體現代化與文字改革等課題，是被置於同一個脈絡來思考及推動的。

台灣新文學運動發展至今已近百年，於現當代應有必要重新討論，而其時代意義應能帶給現當代幾些新的反思。因此，筆者將嘗試以劉捷所列舉的這六篇文章作為討論焦點，來論析運動初期不同背景的台灣知識分子們究竟提出了哪些建言，而他們的意見又是如何影響之後的台灣文學發展方向。

關於黃呈聰與黃朝琴兩人的台灣白話文與言文一致體的具體倡議，或者其他如蔡培火等人的文體改革主張，將在本論文第二節再詳加論析。而正如張安琪所言，台灣新文學史的論述，多半沿用留學中國的張我軍對於舊文學的抨擊，而使得新文學史觀下的台灣文學發展於內容和形式，呈現著不容許模糊界線的二元屬性；「**甚且論者未顧及本土白話文的發展脈絡**」，而逕以中國五四白話文論的外部性文化因素，來比照看待本島白話文的發展，導致台灣白話文的複雜流變，便被消解於中國白話文的普同論述中。[7] 那麼，何以張安琪的所謂「本土白話文」的發展脈絡未被顧及？我們在既有的研究中所能找到的線索似乎很少。究其因，恐怕正是出自於在**台灣的「漢文」**的發音，較「中國話」（華語）更為複雜，且經常具有一個漢字包含「**文言音**」、「**白話音**」、「**訓讀**」等多種具「不確定性」（未標準化）的現象所致。換句話說，**台灣的「漢文」**之「**聲音**」即是「土語」（台灣話），而「土語」的載體正是**台灣的「漢文」**，但此事實，幾乎被現當代僅習慣以華語「閱讀」漢字及漢文的研究者所忽略，以致文體發展的討論也有所歧異。[8]

7 張安琪，〈日治時期台灣白話漢文的形成與發展〉（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6），頁1-3。

8 近年針對台灣的文體發展，最具代表性者莫過於陳培豐提出的「殖民地漢文」概念之論述，此可謂台灣學術界對於日治時期台灣的文體發展一個新觀點的研。見陳培豐，〈日治時期台灣漢文脈的漂游與想像——帝國漢文、殖民地漢文、中國白話文、台灣話文〉，《台灣史研究》15卷4期（2008.12），頁31-86；其相關論文收於日文版陳培豐，《日本統治と植民地漢文一台湾における漢文の境界と想像》（日本東京：三元社，2012.08）；增補論述的中文版收於《想像和界限　台灣語言文體的混生》（台北：群學出版公司，2013.07）。而相對於陳教授此自創的「殖民地漢文」概念所展開的論述，筆者則回到台灣的漢文社會與「台灣話」的緊密關係之語境來考察，並援用當時代之於這些文體的統稱「台灣白話文」這個概念與框架，來重新考察日本時代的台灣近代文體之形成與發展變遷。請參考筆者，〈訓讀、模仿、創造——「台灣白話文」：論日本時代台灣近代文體的形成與樣貌〉，吳梅蘭總編輯，《賴和・台灣魂的迴盪　2014彰化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15.03），頁355-420。

另外，由於語言的問題在既往文學研究脈絡裡也較少被重視，因此新文學運動的導火線之六篇文章當中，特別是蔡培火所提倡的以「白話字」（Pe̍h-ōe-jī，台語羅馬字）寫作台灣話，作為教育之語文工具、普及知識的要件之建議，以及連溫卿在〈將來之臺灣話〉中所呼籲對台灣語文的改革目標，與他所具體提出的改革方案，向來都少見於新文學運動相關的研究當中。[9]

本論文在第三節主要討論將中國白話文帶進台灣的指標性人物張我軍，其於1925年發表的〈新文學運動的意義〉所提案的實質內涵與意義。尤其這篇的刊出時間其實是六篇中最晚，卻也是一個重要環節，即它可能是前述台灣白話文開展以來的短暫時間內，即被消解於中國白話文的普同論述當中的一個開端。而藉著本論文聚焦於此的討論，我們或許可以理出，所謂「本土白話文」的發展脈絡何以未被顧及的線索。

〈新文學運動的意義〉在前半段即強調：「我們現在談新文學的運動，至少有兩個要點：1 **白話文學的建設**、2 **台灣語言的改造**[10]」。究竟張我軍想要建設的是怎樣的「白話文學」？他究竟要怎樣地改造「台灣語言」？他的論述如何使得原應走向「言文一致」的台灣新文學運動，自此走向一種「言文『不』一致」的方向，且使得1930年代的台灣知識分子必需重新發起「言文一致」的論述，而開展「台灣話文運動」？

本論文將圍繞在劉捷所列舉的這六篇台灣新文學的導火線文章，嘗試論析台灣新文學運動初期，知識分子們對於台灣新文學的主張與實際的語文改革提案，並重新定義它們在台灣新文學運動開展初期中的位置。尤其要先藉張我軍的〈新文學運動的意義〉以外的五篇文章之討論，進而來對照、分析張我軍在此文中提起的兩項要點：「**白話文學的建設、台灣語言的改造**」，究竟如何在日後的台灣新文學運動之場域中被討論、實踐，以及因此所產生在台灣新文學

9 目前台灣的文學史論在定位「台灣新文學運動」時，仍將論述面向限縮於1920年代以引進中國白話文所展開的一連串討論與實踐，但近年來例如在台日本學者編輯的《語苑》等語學刊物，或廣於民間流通的「歌仔冊 ，以及長老教會的機關刊物《臺灣府城教會報》當中，所刊出的台語漢字之白話文及教會羅馬字所寫出的文學與文獻等，陸續被重刊或論述出來。的確這些「白話文」皆遠遠早於現今所謂的「新文學運動」，若要建構較全面而完整的台灣新文學史論，這些文獻皆需納入討論。然而，為了篇幅與聚焦討論的關係，關於日人著作的台灣話語學著作、民間的歌仔冊及教會的白話字文獻等，本論文僅在第二節第一小節，以及第三節第三小節當中，以部分具代表性的例子簡單介紹；謹此說明。

10 張我軍，〈新文學運動的意義〉，《臺灣民報》67號，1925.08.26，頁19。

當中的文學現象、語言改造及文字書寫的問題。

而在這之前，以下筆者將先簡單整理1920年代初期，台灣新文學運動**以前**的台灣語文發展狀況，包括前述張安琪所謂的「**本土白話文**」，即台灣本土的「準白話文」之形成概況，再循此脈絡來接續討論這六篇導火線文章之內涵。

二、「台灣白話文」的形成底流[11]與建構

前述六篇文章的發表時間大概是在1923年至1925年，雖然廖毓文將黃呈聰等人以降的討論歸為「**文字改革運動**」，並大致將運動確定於1922年至1933年約十年的座標上。然而，在黃呈聰等人的論述之前，台灣難道沒有「白話文」或者白話文的「雛型」嗎？甚且，在這個語文改革論述相當熱鬧的新文學運動期間，民間難道完全沒有形成一種可視為台灣本土的白話文之文體嗎？以下先以官方編著的字辭典及民間的歌仔冊相關文獻為例，討論官方紀錄及民間流傳的台灣「漢文」之近代化，以及《臺灣青年》與《臺灣》中的「言文一致體」形成前的樣貌，來討論台灣白話文的形成底流與胚胎之狀，進而再討論其他「導火線文章」如何循著原有的「土語書面文」之優劣，來進一步改革與提倡新的白話文。

（一）「漢文」近代化與「土語」書面文的流通

眾所周知，台灣總督府首任的學務部長伊澤修二（1851-1917），其意識到研究台灣話的重要性之後，隨即透過東京帝國大學的語言學者上田萬年（1867-1937）找到其門徒小川尚義（1869-1947）前來台灣幫助編輯，並很快地於1898年出版了台灣第一部日台對譯的《日臺小字典》[12]。而這部全篇達六百餘頁的字典，也可謂是「台灣話」首度較完整地被以現代科學的方法記述下來的書，其所記述的每個「字」，也就是台灣話「口語」的「書面」紀錄。

當然，在伊澤修二主導、小川尚義編著的《日臺小字典》出版之前，日本

11 「底流」一詞借自日語漢字（ていりゅう），原意為河海中的暗流、另有潛伏的主流、底部或深層中流動的思想、情感等意；一般中譯譯為「暗流」，但部分中文字典亦直接註為「底流」。

12 洪惟仁，〈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語音研究之比較——兼論小川尚義在漢語研究史上應有的地位〉，《台灣史研究》1卷2期（1994.12），頁28-29。

領台初期，官方為了能盡快與台人溝通，也很快地製作出台灣話相關的語學教材，光是領台該年的1895年6月至12月，即有《新領地臺灣島》、《日用臺灣土語》、《臺灣日用土語集（臺灣語集）》、《臺灣言語集》、《大日本新領地臺灣語學案內》、《臺灣會話篇》、《臺灣土語》、《臺灣語》八本簡便的台灣話語學教材出版。[13] 而藉由這些語學教材的例句等紀錄，可以看出台語的書面語及口語的書寫規範，在日治初期已有了較現代的初步整理。

例如俣野保和編纂的《臺灣日用土語集（臺灣語集）》（1895.07）當中，除了編入不少台語單字及較短的問候用語或常用語，更收錄了大量稍長的實用台語例文，並且在每一句以「漢字」記錄的例文旁，以片假名註其台語發音。以下舉幾句商店購物用語為例說明：

ū kuí iōng hōo jú khuànnkhuànn tó tsìt iōng khah hó
有幾**樣**給**汝**看 看 那一**樣恪**好。

iā m̄ pân gî iā m̄ kuì jú sìt tsiā kóngkhuànn beh kuí gê tsînn
也不便宜也不貴，**汝實在講**看要幾**个**錢。

tsiōng tsit gê khó í sàng kàu hit íng an kue gún tshù uē īng tsit iā buē
將這個可以送到許永安街我**厝會用的也**沒？

tsit hō gân sik khahtshiàn beh khahtshim tsìt tiám à
這號顏色恪淺，要恪深一點阿。

sī go khoo lák kak sì hun sūn piān theh tsiū sī máh
是五**元**六角四分順便**提就**是嗎？（底線、粗體、框線：引用者）[14]

從這個集子或這個例文本身，雖無法確認編纂者俣野保和如何「揀選」這些台語用字。但首先，從第三句的「永安街（kue）」、「會（uē）」、「沒（buē）」的「泉州腔（偏台北腔）」發音即可知，編者是經過調查或得到台灣／台北人的協助，而能記錄這些發音並記下這些用字；而如此簡短的「例文」，正呈現著台灣話的「口語文」書寫之初期發展樣貌。

再者，從這裡的漢字標記可看出其用字上仍有其「**不確定性與不規則性**」。而從這個「**不確定性與不規則性**」，至少可看到三個問題：①如底線的

13 市川春樹，〈日治最初期台灣福佬話教材編纂之相關考察：日本人對台灣福佬話的認知與概念〉，《台灣學誌》8期（2013.10），頁29-58。

14 俣野保和編纂，《臺灣日用土語集（臺灣語集）》（日本東京：民友社，1895.07），頁71、73、77、80、81。原文以片假名標音，為方便今人閱讀與發音精確性，此引文標音改以教育部台語羅馬字呈現。

用字幾乎和所謂的「中國白話文」相通；②台語用字已有較約定俗成且至今仍通行的用字，如**粗體**字的「汝」（你）、厝、這號、提……；③「文言音」、「白話音」或「訓讀字」的混用：如框線裡的「汝」、「樣」很明顯以文言音讀之；其他看似中國白話文的用字，則是文言音與白話音混用；而「恪」（較）、沒（無）、阿（啊）等則是「訓讀」[15]或假借用字。

值得注意的是①的現象，因與「中國白話文」較相通的用字比率極高，這些用字呈現出漢語詞的「共通性」，而這些共通性便大大地影響我們在閱讀新文學運動時期的文章時，往往直接將它們視為「中國白話文」的傾向。諸如此類的台語短文之例文，在總督府高等法院設立的台灣語通訊研究會發行的最長壽語學雜誌《語苑》（1908-1941）裡也相當多，限於篇幅不再舉例。而這些用字或用詞，田部七郎與東方孝義等台語研究者，則都將它歸類於台灣話的「**文章體**」，即「**書面語（文）**」，多以「**文言音**」發音；而與之相對的即是「**談話體（說話體）**」，即「**口語**」，可能「**文白音混用**」；東方也說明了台灣話在書面語（書寫）與口語（講話）之間有所差異。[16]

關於書面與口語的差異，稍後將再論及。接著再來看看稍晚「**文字媒體**」大量出現後，以「台灣話」為聲音載體的「漢文」，在文體的面貌又是如何。例如1907年的《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所報導的文體，舉其中一則「上海博覽會」的報導如下：

> 上海有開設內外勸業博覽會之議。係本年二月上海在留之外國人間所起。三月二日。英人創立支那協會。希望日本人協會助力。以正式照會來知日本人協會。答謂如協定助力範圍。則無異議**云々**。其後各國協會。皆表賛同之意。在〇他道銀行樓上開第一回相談會。英國支那協會々長斯屈道。上海商業會議所會長肯爾亞。伊國商業會議所員里

15 有關「訓讀」與「白話音」的混用，可參考王育德著，黃國彥監譯，〈第11-13講「文言音、白話音和訓讀（Ⅰ-Ⅲ）」〉，《台灣話講座》（台北：前衛出版社，2010.04），頁115-144。

16 請參考田部七郎、蔡章機共著，《台灣土語全書》（台北：[版權請求中]，1896.05[初版：1896.03]），頁152；東方孝義，〈臺日新辭書緒言〉，東方孝義編，《臺日新辭書》（台北：臺灣警察協會，1931.07），頁12。

覓。美國協會回斯鎮。德國協會武羅低愈省。日本人協會副會長田原豐等六人。會集席上。斯屈道氏對各會代表者。提議仰各本國政府及商業會議所助力。竝要集置保證資金約五十萬弗**云々**。討議之後。議決以千九百九年科期開會。竝此會名曰上海印他那叟那。兮豈斯喜倫。爾來著手設計。**既**買入用地二百畝（一畝二百五坪）若更漸進。則須準備前記保證資金。依次與列國政府交涉。仰其補助。而舉行大設備**云**。[17]（粗體：引用者）

新聞報刊的發行，使得以「台灣話」（語言）被閱聽的「漢文」（文字）這個文體，開始有了明顯的變化。尤其報刊具有「公共性」（Publicness），需以**較「正式」的書面文體**，而非以「完全的口語」呈現，因此最明顯的就是，**發語詞或語尾部份保留了如「係」或「云」等較古典漢文的使用方式**；而其文字內容為報導型，且更因有其即時性，所以也大量夾帶了「**新語**」，行文也漸趨淺白，於是，此時的「漢文」，**雖不以「完全的口語」呈現，卻也已有逐漸朝向白話文體的趨勢**。這種做為新的書面語之「準白話文」，維持了非常久的時間；必須強調的是，因為是較「正式」的**書面文體**，因此在閱聽方面**多以台語的「文言音」**來發音。《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或《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的文體多屬此類。且尤其到1910年代以降，更多的現代設備用語，大量進入這些「漢文」，如1915年的《臺灣日日新報》中有如下報導：

⊙鑿井**瓦斯噴出**

宜蘭廳下利澤簡庄**製酒**公司。**去**月十日。鑿井見水。同時**多量之天然瓦斯噴**出。試用以點火果焚。又曩經竣工之利澤簡**公學校**及五結分校等處之鑽井。亦見**多少天然之瓦斯噴出**云。

⊙淡水線**車遲刻**

去月二十八日下午九時四十分。淡水**發列車**到士林**驛**附近。以**蒸氣**不

17 〈上海博覽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722號，1907.06.01，頁1。

> 揚。不得已停車。**係員**應急**修理**。延遲六十二分。始於同十一時十七分。到臺北**驛**。其他幸無**故障**云。[18]（粗體：引用者）

姑且不論這些「漢文」的作者是日本人還是台灣人，[19]但對於台灣讀者而言，已是一項逐漸習慣的「**閱讀訓練**」，他們透過既習得的漢文台語讀法來吸收並消化這樣的文體。這些文體逐漸走向淺白，而其中的「新語」，即「日語借詞」（Japanese loanwords），即**轉化成「台灣話」的日語詞彙**[20]（如引文中的粗體字），發揮了極大作用，甚且每則報導中幾乎一半用語都來自日語（漢字），但作為「閱讀方」的台灣人，當然不是以日語的「訓讀（くんどく）」方式來接受，更不可能以北京話來讀，而是以「文言音」的「台灣話」來閱讀這種較「正式」的書面文，而其中因夾帶著大量新詞或數字，也使得「文白混讀」的現象日趨頻繁。

這樣的頻繁現象，可見於稍後留學東京的台灣學生所發行的《臺灣青年》與《臺灣》當中，裡頭已可看見各式各樣的「白話文」雛型文體。例如稍長一輩的林獻堂，其〈祝臺灣青年雜誌之發刊〉，已不能視其為全然的文言文：

> 余上京之日。適逢**留學**諸君謀**創刊雜誌**之時。將**介紹世界**之**文明**。以餉我**同胞**。使其擇善而從。又將**紹介**我臺灣之情形。以資**當局**之**施設**。使其漸臻**完美**。所見之遠。所慮之深。令人**欽佩無已**。余雖不敏。亦欲以一言為祝。溯自領臺以來。於今二十有六年矣。**物質**之**發達**。殆有**一日千里**之概。而**精神**之**進步**。則尚遲々。其故何也。略舉數端如下。……[21]（粗體：引用者）

---

18 〈鑿井瓦斯噴出〉、〈淡水線車遲刻〉，《臺灣日日新報》5281號，1915.03.03，頁6。

19 但從「去月十日」的「去」（去る）或語尾的「云」來看，即在文法的使用來推論，或者眾多的日語漢字（對台人而言則是以台語發音的「日語借詞」），這些報導性文章的作者，可能多是日人為主。

20 一般我們對日本時代的「**日語借詞**」之概念，多將它停留在「日語」，但既是借詞，即意味著它已經成為「**台語**」。另外，戊戌變法時期以降，中國的近代語文也大量使用「日語詞」成為新的「漢語」，解決了漢語中新名詞缺失的局面，且藉由報刊、教科書、辭典、百科全書、或者知識分子的譯名討論等達到普及，往後成為「**中文**」的慣用詞彙。請參考黃曉蕾，《民國時期語言政策研究》（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06），頁45-49、79-80。

21 林獻堂，〈祝臺灣青年雜誌之發刊〉，《臺灣青年》1卷1期（1920.07）漢文之部，頁2。

這種**極不純粹的「文言文」**，其中的「余」、「之」、「無」、「已」、「亦」、「欲」……當仍是以「文言音」讀之；但如「留學」、「雜誌」、「發刊」、「文明」、「當局」、「施設」、「物質」、「發達」、「精神」、「進步」……，這些恐怕多是「日語借詞」的「新台灣話」[22]。旅居日本的中國學者陳力衛是研究「和製漢語」的權威之一，他提出和製漢語雖也有不少是取自中國古典或近代以來的詞彙，但其中多有與中國本地原義不同之處，甚且因20世紀初期中國留學生翻譯許多日本書籍，而將這些和製漢語重新傳播到中國或亞洲各地。[23]也就是說，這些現今吾人習慣使用的中國語詞，反而是以「和製漢語」之姿「逆輸入」回到中國而更廣為使用，而殖民地台灣人則早在當時就直接接收和製漢語並借用成為「新台灣話」；而它們可能以「文白混讀」的方式被發音，且亦是形成台灣近代文體的一個相當重要的骨架。也因這種「半文半白」的新文體之大量產生，促使了新一代的知識分子開始醞釀、思索語文改革：即走向全然的「白話文」之可能性。

除了官方編纂的字辭典，或者報章雜誌的新文體之外，自清國時期即流傳民間的「歌仔冊（kua-á-tsheh）」，亦已有將「白話音」的漢字約定俗成地記載下來之趨勢。王育德曾記述台南鄉土家賴建銘的報告，列舉道光（1820-1950）年間在台灣刊行的「歌仔冊」八種，其標題皆有「新刊」字樣，王推測歌仔冊的形成應更早。[24]王育德在碩論〈台灣話表現型態試論〉（1958）中，使用的語料即為歌仔冊，[25]並且他曾駁斥尾崎秀真謂清代無台灣文學之論，他認為清代即存在著台灣文學，那就是歌仔冊。王育德又說，雖「歌仔」已有著

---

22 林茂生曾於《台灣教會公報》發表〈Sin Tâi-oân-ōe ê Tîn-liàt-koán〉（新台灣話的陳列館）專欄，自1933年12月至1935年3月共連載15回，以台日英三語簡介了133個源自日語的新台灣話；可參考張妙娟，〈《台灣教會公報》中林茂生作品之介紹〉，「殖民地教育、日本留學與台灣社會——紀念林茂生先生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日本同志社大學主辦，2002.09.19），頁13-14。

23 陳力衛，〈和製漢語と中国語〉，《比較日本学教育研究センター研究年報》8号（2012.03），頁218-220。關於這方面的研究，陳力衛另有《和製漢語の形成とその展開》（日本東京：汲古書院，2001.02）、《漢字文化圏諸言語の近代語彙の形成—創出と共有》（日本大阪：関西大学出版社，2008.10）、《近代知の翻訳と伝播：漢語を媒介に》（日本東京：三省堂，2019.05）等專書。

24 王育德著，黃國彥監譯，《台灣話講座》，頁195-196。這八種包括：「新刊台灣朱一貫歌」、「新刊台灣陳辨歌」、「初刻花會新歌」、「新刊莫往台灣・女人卅六款歌」、「新刊戲闖歌」、「新選笑詼俗語歌」、「新刊拔皎歌」、「新刊神姐歌」。

25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台灣話講座》，頁182。

既定的書寫形式，卻因其以通俗的台語寫成，而受讀書人輕蔑，因此無法得到進一步發展。[26]

流傳民間的歌仔冊，其約定俗成的用字，呈現怎樣的面貌呢？例如歌仔冊最經典的作品——改編自《荔鏡記》的「陳三五娘」的開頭如下：

> **廣**起福建一故事，泉州城外伊本居，出有風流**兮**才子，聰明**介**世好詩詞。
> 做人朋友**正**愛交，這層**兮**事清朝頭，**因**爹陳鳳字昔孝，兄弟三个人**真肴**。
> 泉州城外洞天嶺，嶺後陳厝有名聲，丁財兩旺真好命，必卿**水**去**正**出名。
> 昔孝三个親生**子**，必卿**真水**排第三，必敬被賊驚破胆，順治時代死到今。
> 必敬十八過一世，兄弟真正可憐伊，陳鳳煩惱**子**來死，病入膏肓無藥醫。
> **那**病**只欸**極**呆**創，**因**某姓張名綉紅，張氏早々就過往，庄中專**因兮**親同。
> 必卿早々就無爸，原居泉州塊倚家，出門**格**甲**那**子弟，真正愛選未婚妻。
> 六月初六開天門，兄弟跪**在**天中央，必賢共**因**小弟問，有官通做蔭全莊。
> 必賢祝天求完滿，**卜**求通好做大官，必卿無想欲**按盔**，某**水**比官**恰**有盤。
> 必賢**卜**求大官做，心肝伊想**恰**正**徒**，陳三**卜**求娶水媒，**真正**風流**兮乾埔**[27]。（粗體、底線：引用者）

引文當中的粗體字主要是借音或借義的「假借字」，某種程度已約定俗成，而標底線者則更是至今仍被廣泛使用的用字，約定俗成之程度是更高的。其他用字，則是與中國，或說中國白話文也**通用的「漢語詞」**。而特別是粗體字當中的「假借字」，即以王育德所謂「通俗的台語」寫成；因此通俗，於某方面來說意味著「不雅」，不雅則不足以成為正式的「書面」用字，而這正是知識分子眼中認為應該改革之所在，即張我軍提倡「台灣語言的改造」的重點之一。這一點於第三節再深論。

即便如此，多有假借且通俗的「歌仔冊」用字，卻已然有其約定俗成的

26　王育德著，呂美親編譯，〈同情與理解的距離——尾崎秀樹著《近代文學傷痕》〉，《漂泊的民族　王育德選集》（台南：台南市文化局，2017.02），頁237-238。

27　此引自竹林書局發行之《陳三五娘歌 全四集》版本（新竹：竹林書局，1986.03），頁1。

文字面貌與功能性，於往後的新文學運動中仍發揮極大作用，例如一些白話詩或歌謠中的使用，或者台灣話文作品中的用字，再或者是其他「類中國白話文」的小說中的對話用字（敘事文字則多使用與中國白話文共通性高的「漢語詞」）等。

綜言之，無論是官方編著的字辭典、具公共性格的漢文報紙，或者自清代以來即流傳民間的「白話」創作「歌仔冊」，我們確認了新文學運動以前，早已存在著台灣本土白話文發展的底流與實際的形成面貌。換言之，以「漢文」為基礎開展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其使用的文字與文體的走向，並非一朝一夕的突然顯現，或者僅僅因為受到單一運動的影響而發展所來；這些字辭典、具公共性格的漢文報紙，或者流傳於民間的「歌仔冊」等，早在中國白話文引進台灣之前，就已預備了極為實用的工具與豐富的材料，提供台灣的新文學運動在書面語與口語兩方面的書寫嘗試與改革基礎。

以下循著前述的理路，接著論析劉捷所舉的這六篇新文學運動的導火線文章，各自所提倡的主張與意義。

（二）「言文一致體」的倡議：黃朝琴、黃呈聰（兼論陳端明）

首先討論黃朝琴與黃呈聰的論述。而此前，我們必須再重新想起「言文一致」這個概念在日本的運動與實踐。

言文一致的實踐，促使日本（語）的近代文學在發展時，其文體也產生種種細緻變化。自明治以降的東京時代開始，文體就漸與江戶時代前的古典漢文產生變異，研究者飛田良文即把東京時期的文體視為「**非言文一致體**」；此文體其中還包含**漢文體**、**漢文直譯體**、**和文體**、**候文體**、**歐文直譯體**等類。這些「非言文一致體」也逐漸發展成文言與口語並存、但基本上仍屬較文言文的「**普通文體**」；直到明治末期的言文一致運動，才成就了「**言文一致體**」，同時也發展出更符合「我手寫我口」的「**口語體**」；而所謂的「**言文一致**」，其真正被完成，則要到1920年以降。[28]

28　參考飛田良文編，《国語論究第11集　言文一致運動》，頁4-19。

筆者也曾參考日本的分類，嘗試將台灣新文學運動前後的文體大致分類為：「**非言文一致體**」、「**言文一致體**」、「**白話文章體**」、「**雅俗折衷體**」、「**口語體**」、「**通俗白話體**」等幾種文體，[29] 做為未來對於將台灣白話文發展的各種文體更加細緻分類的基礎。例如1920年代初期如《臺灣青年》中那文言與白話混用的文體，可視為台灣的言文一致前夕的痕跡——「**非言文一致體**」，即近代台語「**書面化**」的初期實踐。而必須再強調的前提是，同樣半新半舊、半文半白且仍具不順暢的「人工性」，但日本文章的語言是日語，而台灣文章的語言是台語。

最早見證日本的言文一致運動，並將此書寫觀介紹回台的台灣人，其實是陳端明。陳端明在1921年刊於《臺灣青年》的〈日用文鼓吹論〉一文中，已經提及「言文一致」，且以此概念呼籲台人寫作「**日用文**」，即該文中所提及的「**白話文**」或「**白文**」：

> 在鄙人之見，即廢累代積弊，新用一種**白文**，使得表露真情，諒可除此弊。試觀現今所謂文明各國，多**言文一致**，唯臺灣獨排之，此因承教於中華之後，故言文各異。然今之中國豁然覺醒，久用**白話文**，以期**言文一致**。而我臺之文人墨士，豈可袖手傍觀，使萬衆有意難伸乎！切望奮勇提唱，**改革文學**，以除此弊，俾可啟民智，豈不妙乎？[30]（粗體及底線：引用者）

廖毓文認為，此文雖提倡中雖有謂「白文」及「白話文」，卻仍以「文言文」所寫，且刊出當時還不受注目，因此他認為留學於早稻田大學的黃呈聰與

29　請參考筆者，〈訓讀、模仿、創造——「台灣白話文」：論日本時代台灣近代文體的形成與樣貌〉，《賴和・台灣魂的迴盪　2014彰化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30　陳端明，〈日用文鼓吹論〉，初出：《臺灣青年》3卷6期（1921.12），但該期被禁，後重刊於4卷1號（1922.01），轉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　明集5・文獻資料選集》，頁4。

黃朝琴兩人的文章發表之後，白話文運動才正式納入軌道。[31] 先不論當時是否受到注目，陳端明的確明明白白地將「言文一致」的概念引入台灣，甚且，其提倡白話文的目的之一在於「改革文學」。也就是說，「言文一致」一開始被提倡，固然是就文字書寫方面的建言，但初始的目標也已與文學的改革加以連結。

廖毓文認為，陳端明「是要提倡『中國白話文』或『台灣白話文』，因其說明缺詳，不無議論的餘地，但是通讀全文，不難揣度其意，是要鼓勵採用『中國白話文』」，即胡適所謂『國語的文學』的。」廖的推測恐怕有失精確，因為「新用一種白文」，即陳氏文章題中的「日用文」，其向台人建議的是建設一種屬於台灣人的新文體，雖提及中國，卻非明示全盤引入。甚且，這篇文章也並非全然的「文言文」，它可謂是「言文一致體」的前階段文體，即「非言文一致體」，仍有不少書面式的漢語詞，與前引之林獻堂〈祝臺灣青年雜誌之發刊〉之體式類似。

而的確真正開始實踐「言文一致」的概念、寫作「言文一致體」的，即是黃朝琴與黃呈聰。他們的文章發表後，隨即帶動了更多對於白話文體的討論。首先，例如黃朝琴的〈漢文改革論〉，其續篇副標為「唱設台灣白話文講習

31 廖毓文，〈台灣文字改革運動史略〉，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5・文獻資料選集》，頁460-461。而在陳端明的〈日用文鼓吹論〉（1921.12）刊出前，《臺灣青年》創刊號即可見**陳炘的〈文學與職務〉**（1920.07），翌年亦有**甘文芳的〈實社會の文學〉**（1921.09）等文，皆談及文學需要改革與文學內涵，但較無直接對文學的「語文」提出具體的改革意見。較具體的意見恐怕是**植村正久的〈臺灣の青年に望む〉**中提出的羅馬字論，這部份將在下一小節論及蔡培火時提及，包括1卷3號**田川大吉郎的〈歐米の思潮と羅馬字〉**。另外，陳炘之文與陳端明之文主要仍以文言文呈現，而甘文芳之文以日語寫出，刊出時間又早，即便帶有語文改革的意見，仍不受太大注目。除了在東京發刊的《臺灣青年》與《臺灣》以及當時還未在台灣島內發刊《臺灣民報》，臺灣文化協會於1921年11月發行的《臺灣文化協會會報》，當中對於語文的觀點也值得注意。例如目前可見的第3號（《臺灣文化叢書》，1922.04）復刻版（台北：蔣渭水文化基金會，2011.10），其中亦可見**林子瑾的〈文化之意義〉**（續會報第1號），此文亦非以白話文寫成，而是以文言文呈現，文末也提出了白話文或羅馬字的改革建議：「鄙見於臺灣文藝界，當有一番革新，以改從來古文體為白話文體，或用羅馬白話字代之，使一般之人容易讀之，又對詩之一藝大為推進，則臺灣文化受此之助，其向上之勢，當一瀉千里也，準此以談，文化與文藝之關係，誠大矣哉。」（頁43-44）。另外，《臺灣文化叢書》中有連溫卿譯自維也納世界語刊物的作品〈心と懐中時計〉（心與懷錶）及其短論〈右か？左か？〉（左，或是右？），以及《臺灣之文化》中亦有作者「簾人」的〈民族と言語を思ひて〉（思及民族及語言）與〈支那に於ける非宗教運動〉（中國的非宗教運動），此兩篇可推測為左翼運動者兼世界語者連溫卿的筆名，該期亦有**連溫卿**介紹〈**学校に於けるエスペラント教授に関する国際会議**〉之世界語宣傳文，這些文章的內容與世界語的思想及和平運動皆有關連。而該期也有一篇**陳青錦〈漢文論〉**，為擁護漢文的主張。從這會報3、4號，亦可見不同角度語文改革和語言教育的論述，足見運動初期的多種觀點。而本論文引劉捷所舉六篇，乃除了漢文論之外，也大致涵蓋這些觀點。

會」，文中直接呼籲「言文一致體」的落實：

> Í siōng-tsió ê sī-kan sú in tit-tióh siōng-tuā ê tì-sik Kàu-siū ê hong-huat iōng giân-bûn it-tì ê
> 以最少的時間，使他們得著最大的智識。教授的方法，用言文一致的
> bûn-thé Í giân-gí kun-kì sú thiann-kóng ê bûn ìk kì ìk siá bián ku hîng-sik put tián-kù
> 文體，以言語根據，使聽講的文，易記易寫，免拘形式，不典句，
> khí-pit siá-pèh tsiū-sī
> 起筆寫白就是[32]。（標音：引用者）

文中的「得著」、「使聽講的文」不僅是白話，更可知為台語文法；「言語」則是由轉化成台語的日語借詞，即「語言」之意。當時若受過漢文訓練的讀者，即能分辯文白與訓讀，而以台語念出全文。而其中「言文一致的文體」，即「**言文一致體**[33]」，且全篇多處提及「言文一致」，可知作者應接觸不少言文一致的相關討論。尤其「以言語根據，使聽講的文，易記易寫，免拘形式，不典句，起筆寫白就是」之語，完全符合於1886年提出言文一致的物集高見所言：「『言文一致體』即明明白白的**書面語**」，而「所謂**『言文一致』，並非如何言說就如何書寫，而是能創造出新的文體才有了意義**」等說詞；此亦即日本學者安田敏朗闡釋的「言文一致」第一層「書其所言」之義，即**書面語的落實**[34]。另外，黃朝琴認為當前總督府恐怕不會致力此事，他建議可先從民間以獎勵方式做起：

> Tsāi guá ê ì-kiàn siàu-lián ê hák-sing ē-tàng tsióng-lē i lāu-huè ê lân put-jû kà i ò̍h Tâi-uân
> 在我的意見，年少的學生，可以獎勵他，年多的人，不如教他學台灣
> tsāi-lâi pèh-uē-bûn khah sī lī-ik tshiūnn tsit-tsióng ê sū-giap̍ kiò Tâi-uân tong-kiok lâi tsò si̍t-tsè-siōng sī bô
> 在來白話文，較是利益，像這種的事業，叫台灣當局來做，實際上是不

32　黃朝琴，〈續漢文改革論　唱設臺灣白話文講習會〉，《臺灣》4年2號（1923.02），頁27。其中的「他們」讀作「in」，乃有文獻可尋。從甘字典可知，「們」為複數表現，唸作「bûn」、「būn」、「lín」等。亦即，「們」的白音就是「lín」，而「他（i）」、「你（lí）」、「我（guá）/人（lâng）」加上「lín /ǹ」，再模仿近代白話書寫，即成「他們（in）」、「你們（lín）」、「我們（guán/lán）」等轉化成台語單音節的名詞。甘為霖，《Ē-mng-im Sin Jī-tián（廈門音新字典）》（台南：台灣教會公報，1913.07）。頁38、453。但正因如「他們」、「我們」、「你們」的模仿，有「**屈二字去就一字**」（**屈話就文**）之嫌，黃石輝才提出採用新代字，如「伻」、「咱」、「恁」的寫法。參考氏著，〈言文一致的零星問題〉，引自中島利郎編，《1930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出版社，2003.03），頁281-282。

33　楊雲萍於戰後初期的引用則直接將此句改為「用言文一致體」。楊雲萍著，〈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回顧〉，《臺灣文化》1卷1期（1946.09），頁10。

34　請參考安田敏朗著，呂美親譯，〈日本「國語」的近代〉，《東亞觀念史集刊》3期（2013.03），頁86。

khó-lîng ê
可能的？[35]（標音：引用者）

黃朝琴明確地定位其欲推廣的文體為「**台灣在來的白話文**」，即屬於台灣本地的白話文。最後且強調，「小弟雖然對這件不甚把握，此後一定專工研究，極力欲宣傳這個白話文的必要，台灣若有同志的人，欲開講習會，小弟願往幫忙」云云。其呼籲的是學習日本走向言文一致，完成**台灣語言書面化**的工程。

另外，黃呈聰在〈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雖也提及在中國見到中國白話文運動的成功，但事實上也不是要直接將中國白話文全盤搬回台灣。黃呈聰1916年即成為日本世界語學會會員，世界語運動也屬於日本語言文字改革之一環，黃氏留日期間接收言文一致書寫觀，應是台人知識分子之中極早的。[36] 他在文中推崇日本提倡「**言文一致體**」的議論，並提出這樣的建議：

> 將日本話教我們是好，總也要教我們**台灣話**，自小學起用我們的話來教各種的科學和一般的智識，豈不是普及文化快一點嗎？若是更進一步，**用這個白話文做漢文自小學教他到六個年卒業**，就社會上的利用是很方便了。我很希望當局採用這個**白話的文**，放棄那深遠難解的古文，這是最要緊的。[37]（粗體：引用者）

也就是說，黃氏呼籲的白話文普及，在發音上是「台灣話」，他希望教育當局以這個「白話的文」來教育台灣的學童，有利於未來在社會上的應用。黃

35 黃朝琴，〈續漢文改革論　唱設臺灣白話文講習會〉，《臺灣》4年2號，頁26。

36 日本世界語學會機關誌《Japana Esperantisto》（日本世界語者）於1916年3月的繳費之會員名單可見黃呈聰之名。兒玉四郎在1913年開始在台宣傳世界語，翌年後在全島已擁有不少函授學生，當時彰化研究會代表即黃呈聰。參考〈內國消息群組注音　台灣支部〉，《Japana Esperantisto》11卷8期（1916.08），頁11；連溫卿，〈台灣に於けるエスペラント運動年代記〉，《Informo de F.E.S（台灣世界語學會通訊）》1期（1931.12），頁10-13。台灣的世界語運動概況請參考筆者，〈日本時代台灣世界語運動的開展與連溫卿〉，陳翠蓮、川島真、星名宏修主編，《跨域青年學者台灣史研究第五集》（台北：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2013.08）。而就前註32來看，黃呈聰文中的「我們」即「屈話就文」地讀為「lán」。

37 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臺灣》4卷1期（1923.01），頁32。

呈聰與黃朝琴兩人的文章得到不少迴響，《臺灣民報》上的文體書寫也漸趨白話。但也因為同時期已有留學中國的學生引進中國白話文，對於中國白話文的掌握較島內台灣人熟悉，或者也誤以為台灣人提倡的「白話文」一定就是中國白話文，於是對於台灣人因為語言使用，以及前述約定俗成的用字習慣所寫出的「白話文」加以批判。

例如留學上海的施文杞發表了〈對於臺灣人做的白話文的我見——臺灣人的研究白話文者注意——臺灣人的投民報者注意〉一文，強烈批判《臺灣民報》上的白話文之文字使用，且引林耕餘所論：「台灣人做的那種白話文，真是弄笑話！他們**做那種**台灣式的白話文，要是他們**後日**到中國來，豈不還要習中國的白話文嗎？……[38]（粗體與底線：引用者）」。由這樣的批判可知，《臺灣民報》上初期刊登的白話文，事實上並非道地的「中國白話文」，而是台灣人自我發展的白話文體；且包括林耕餘和施文杞自身的文章，其實都帶著濃厚的台灣式書寫。也因此才有接下來張我軍一連串的論述。但在張我軍之前，島內對於「白話文」的想像，仍有其他具體的意見，以下論之。

（三）取徑世界的語文改革意見：蔡培火、張梗、連溫卿

面對新時代且是國際化的來臨，加上包含著在教育現場推廣普及的意義，書寫「白話文」成為一個共識與趨勢。但要用哪一種「文字」書寫，則有開始有不同背景的知識分子提出意見。

在日本的言文一致運動最興盛的1920年代，「羅馬字運動」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實踐路線。[39] 眾所周知，以白話字（教會羅馬字）書寫的台灣第一份報紙《臺灣府城教會報》於1885年創刊後，留下語料、文學及文化等大量文獻，

38 施文杞，〈對於臺灣人做的白話文的我見—臺灣人的研究白話文者注意——臺灣人的投民報者注意〉，《臺灣民報》2卷4號，1924.03.11，頁8。同頁即有逸民（林耕餘）的〈對在臺灣研究白話文的我見〉，頁8-9。

39 相關背景請參考安田敏朗，《「國語」の近代史——帝国日本と国語学者たち》（日本東京：中公新書，2007.03），頁36-38。

教會發行的白話字刊物或單行本也累積不少現代台語文學作品，[40] 都早於所謂的台灣「新文學運動」。而本論文聚焦於以《臺灣青年》及《臺灣民報》為主的語文改革論述，其中推動羅馬字的蔡培火，也應是將台語羅馬字跳脫基督教圈，而在一般文化人或知識圈中的主要普及者。身為基督徒的蔡培火，若非見證了日本的羅馬字運動對於言文一致的觀點，其在台灣的羅馬字運動推行，恐怕也不那麼積極。這從發刊於日本、且創刊號封面以羅馬字標註「The Tâi-oân Chheng-liân」的《臺灣青年》中，刊載思想家植村正久[41] 與眾議院議員田川大吉郎兩位羅馬字論者的文章，即可理解。植村正久在〈台灣の青年に望む〉（寄望於台灣青年）一文中，肯定台灣的基督教之間已實行羅馬字久矣，認為是一大進步，應予以普及；且說內地的羅馬字論者也心繫此事，欲聲援台灣的羅馬字實踐者。[42] 而田川大吉郎[43] 則在〈歐米の思潮と羅馬字〉（歐美思潮與羅馬字），提出採用羅馬字乃為開發台灣最有效之計劃。[44]

日本的羅馬字運動因應國際化的來臨而被加以推動，而這也影響了留學日本的蔡培火，對於台灣語文改革的想像。其〈新臺灣の建設と羅馬字〉（新台灣建設與羅馬字），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所提出的對於台灣的新的文字／文體之意見：

40 發刊於台南的《臺灣府城教會報》及台北淡水的長老教會刊物《芥菜子》當中的文化或文學相關的作品眾多，目前較全面的精選作品已被以「漢羅」形式改寫，讓今人較易閱讀。可參考蔣為文總編輯的《台語白話字文學選集》五冊（含：文化論述kap啟蒙、台譯文學、詩・歌、小說・劇本、散文。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11）。1920年代的台語白話字長篇小說，主要有李勤岸的「漢羅」改寫及譯註版，包括：賴仁聲著，李勤岸譯註，《俺娘ê目屎》（台南：開朗雜誌事業公司，2009.12；原出1924）、鄭溪泮著，李勤岸譯註，《出死線》（台南：開朗雜誌事業公司，2009.12；原出1926）等多部。相關的文學史論可參考施俊州，〈第一章〉，周定邦主編，《台語文學導論》（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12）、廖瑞銘，〈第二章〉，《舌尖與筆尖：台灣母語文學的發展》（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10）。

41 植村正久（1858-1925），日本重要思想家，與田村直臣、松村介石、內村鑑三並稱日本基督教界的「四村」。1902 年至1920年間前後來台10次。請參考京極純一，《植村正久　その人と思想》（日本東京：新教出版社，2008.01），頁10；其次女植村環曾任台南長榮中學校長，可參考坂口直樹，《 前同志社の台湾留学生　キリスト教国際主義の源流をたどる》（日本東京：白帝社，2002.05），頁58-60。

42 植村正久，〈台灣の青年に望む〉，《臺灣青年》1卷1期（1920.07），頁27-28。

43 田川大吉郎（1869-1947），評論家、社會運動者、眾議院議員。1896-1897年曾任職《台灣新報》，曾為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向眾議員上呈意見。參考楠精一郎，《大政翼賛会に抗した40人　自民党源流の代議士たち》（日本東京：朝日新聞社，2006.07），頁40。

44 田川大吉郎，〈歐米の思潮と羅馬字〉，《臺灣青年》1卷3期（1920.09），頁33。

> 羅馬字的普及，無非是個被熱切期待所促成的運動，它要向人們介紹**現代文化**的狀況，以此改善其生活，增長其見識，將其思想拉至與一般人相近的同等水平之高度。（中略）內地人的有志者、有識者們，請盡早學習台灣話吧。用台灣話來向台灣本島人傾注你們愛國愛民的赤誠摯愛，讓台灣能迎向極度的進步與穩定的發展。為此，請先將研究台灣話獨一無二的輔助工具羅馬字牢記。西洋人花兩年的時間學習，便能以流暢的台語傳教，全靠羅馬字的功勞。**羅馬字普及實是台灣文化的基礎工程**。有識者依此得以將其思想、情誼傳達給一般的本島人，而無識者則能依此，快速地獲得**現代文明**的恩典。[45]（粗體：引用者）

蔡培火推行羅馬字的目標在於快速讓台灣人獲得「現代文明」的恩典與洗禮，以此手段做為建設台灣文化的基礎工程。甚且，蔡更呼籲在台的內地人也應學習台灣話，像西方人一樣用羅馬字來快速學習台灣話，則可促進台灣的進步與穩定的發展。這樣的倡議，不僅是期待台灣走向「新」的階段，更藉此邀請內地人共同以此建設新台灣，實是極高遠的理想。而蔡以羅馬字面對「現代文明」的看法事實上與黃呈聰的基本觀點相似，都是要將台灣話加以書寫（但黃則是以漢字出發的白話文），進而落實於教育現場，使台灣人得以生活於新的「現代」社會。

蔡培火此文刊於《台灣》，它是繼植村正久、田川大吉郎，以及台人張洪南〈誤解されたローマ字〉（被誤解的羅馬字）[46]之後，所發表的較完整的「**以羅馬字改革台灣話文字**」的論述。這篇文章在翌年的1923年又稍作修改並重刊於《臺灣民報》[47]，而蔡培火在1925年發行的全文以羅馬字書寫之論集《十項管見》中，其第二項即是「新台灣與羅馬字的關係」[48]。若對照明治末

45 蔡培火，〈新臺湾の建設と羅馬字〉，《臺灣》3卷6期（1922.09），頁45-46。原文日文，引用者中譯。

46 張洪南，〈誤解されたローマ字〉，《臺灣》4卷5期（1923.05），頁48-54。

47 蔡培火，〈新臺湾の建設と羅馬字〉（一），《臺灣民報》13號，1923.12.11，頁14-16；蔡培火，〈新臺湾の建設と羅馬字〉（二），《臺灣民報》14號，1923.12.21，頁12-14。

48 請參考張漢裕主編 張炎憲總編輯，《蔡培火全集五　台灣語言相關資料》上（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0.12），頁189-199。

期的「國語國字問題」等相關議論來看，這些文章皆可論台灣的言文一致運動之一環，且對於往後台灣語言的標記，甚且是台灣文學之口語體書寫——台語文學的發展，有著極大的影響。而雖然蔡培火的文章似乎未直接提到「文學」，但也正如黃得時所言：

> **新文學運動本來是新文化運動的一部份**，而臺灣的新文化運動，是開始於民國九年（日本大正九年、西元一九二〇年）。當時，無論在政治方面或者是在社會方面，早已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弱小民求解放，爭自由，反橫暴，謀和平的影響，在東京的臺灣留學生之間，**組織了「臺灣青年雜誌社」，發行「臺灣青年」月刊，藉以提高民族意識，扭轉社會風氣，反抗臺灣總督的專制政策**。[49]（粗體：引用者）

也就是說，蔡欲以羅馬字建設的台灣文化論，其內涵即包含著建設新文學的觀點。甚且，其後的《臺灣青年》封面亦可見「The Tâi-oân Chheng-liân」之字樣。黃得時且引《臺灣青年》創刊號的卷頭辭而論：「上面所主張的，雖然是著重於台灣新文化的全面建設，對於文學方面並沒有特別提及，可是這種討厭黑暗，追慕光明，反抗橫暴，尊重自決的覺醒，**對於未來的新文學運動，已經舖好了一條應走的路徑**，準備了一片應開的園地，期待著後人的播種和收穫。（粗體：引用者）」[50] 準此，則黃朝琴、蔡培火、黃呈聰等人對於新的文字、新的文體之提倡，亦可謂是為了未來的文學改革所提出的基礎工程之建議。

接著是張梗的〈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此文於《臺灣民報》連載七回，篇幅是「導火線文章」當中最長的。主要以「獨創」、「創作需含意」、「含意需深藏」、「排（除）春秋筆法」、「唱科學的態度」、「歷史與小說須分工」六個主題展開論述。首先，作者批評了流通於台灣閱讀市場的作品，

---

49 黃得時，〈臺灣新文學運動概觀〉，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5・文獻資料選集》，頁269。

50 同註49，頁270。

包括《荔鏡記》、《西廂記》，或者是「布地（按：袋／tē）戲」、「彥仔朝」、「小飛虎」等排演的戲劇，甚且是聊齋等多妖精鬼怪或才子佳人作品，幾乎與民眾日常生活無關痛癢，帶著極色彩濃厚、欠缺獨創性的貴族氣。文章更提出二十世紀的新文藝、新的小說應「**重個性**」並發揮「**獨創性**」，而要達到此目的，唯持有「**科學的態度**」。[51]

從日本的近代文學發展來看，「言文一致」最早的實踐場域或者文本，亦是在小說的書寫。中國的白話文運動之所以成功，現代小說的作品累積亦是重要的推波助瀾之力。因此，作為台灣新文學的導火線文章當中，唯一從小說的角度來探討文字改革與文學問題的文章，張梗的〈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有其重要的歷史意義。

倒是，楊雲萍認為，張梗對於文學的真實與現世的現實之差異不夠了解，且認為其將戲曲《桃花扇》歸於小說論之，實有不妥，但亦指其在仍微弱幼穉的台灣文學界中，提倡科學的態度而作此勞力之文，值得紀念。[52] 而有趣的正是，張梗批判的中國小說多屬古典文學或《水滸傳》及《紅樓夢》等晚近的章回小說，對於中國五四運動以來的白話小說創作似乎較少有著墨，反而所舉的傑出之作則是易卜生、左拉等人的西洋文學作品，或者俄國托爾睨呢夫的思想之作。甚至將日本作家國木田獨步的小說〈疲勞〉之日文原文，大篇幅地引用於文中，供讀者試閱此「二十世紀的新文藝」[53]。這樣的引用，呈現了張梗希冀的「舊小說的改革」思考，內含著接受西化與日本的文藝思潮之意向。因此，在強調小說的「科學的態度」時，張梗介紹了西方文藝的各種主義：

> 古人欠缺科學思想只熊腦裡的攪漿捏出小說，亦無怪其然，西洋還未到自然主義、浪漫主義色彩當盛的時代，也是一樣主觀抒情，而科學的發達影響到文藝方面，一經自然主義的洗禮，就不得不變到寫實主義的態度了。非真不寫排去一切邪推憶測。[54]

51 張梗，〈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一），《壹灣民報》2卷17期，1924.09.11，頁15-16。
52 楊雲萍，〈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回顧〉，《臺灣文化》1卷1期（1946.09），頁11。
53 張梗，〈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二），《臺灣民報》2卷18期，1924.09.21，頁16。
54 張梗，〈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五），《臺灣民報》2卷21期，1924.10.21，頁16。

也就是說，張梗固然亦曾接受漢文教育、閱讀中國經典文學作品，但其「新文藝」的思考、對於「新文學」的想像，恐怕多是受到西洋與日本的文藝思潮之影響，而非中國。尤其除了前述的國木田獨步的小說之引用，張梗亦在文中推崇小說家島崎藤村，常披著「一領毛布」（tsit-niá môo-pòo，固有台語+日語借詞），裝成勞働者（勞工）並前往上野公園觀察，以獲取小說材料。換句話說，張梗對宗主國日本的文學發展幾乎是同步掌握且即時響應的。

〈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最後談及「歷史與小說須分工」。他強調：

> 小說從技倆方面而論，最重要者一外乎描寫。描寫的性命是在於採「個性」而棄「類性」。我們要寫出如斯複雜微妙的心理，非用斯言斯語不得傳神的時候，須知道這個「斯言斯語」雖區々的動詞、形容詞實勝過呶々千要言。[55]

簡言之，張梗想要提倡的「新小說」是極重視個人與內心描寫的，是要「提供人生的改造問題」而「非教訓」或「含有道德的性質」的。[56] 即前述所言，這些思考，受到西方文藝思潮與日本近代小說當時重視寫實主義等文學風格極大的影響。從這個觀點來看，台灣新文學運動初始的文學觀之引進，相對來說與中國白話文運動恐怕並不是真的那麼密切，反而是藉由日本或直接取徑西方世界的觀點之下，所進行的文體與文藝思想之改革。中國白話文與中國白話文學的種種觀點之引進與影響，要到隨後的張我軍之一系列的言論與倡議才開始。

就「導火線文章」諸位作者的學歷而言，其他作者非留學日本，即留學中國，但連溫卿則僅公學校畢業，而後卻成為「臺灣文化協會」的領導人，且是帶領文協左傾並走向分裂的重要人物。學歷最低的連溫卿，其〈將來之臺灣話〉一文，不僅以社會學的觀點來思考語言的問題，更具體提出了台灣話的文法之制定；而其對於台灣話的語文思考，乃是因其投入「世界語運動」所

55 張梗，〈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七），《臺灣民報》2卷23期，1924.11.11，頁20。
56 張梗，〈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四），《臺灣民報》2卷20期，1924.10.11，頁16。

來。[57]

〈將來之臺灣話〉分3回連載，全文共分成「言語的觀念」、「言語的起源」、「近世之言語問題」、「臺灣話的將來」、「臺灣話文法暫定」5個主題展開討論。作者在首段即強調：「不論在甚麼地方，**若有了革命，那時言語和文字沒有不隨他變換**，因為言語是表現社會的觀念工具，我們以此可以知道言語與文學和社會有重大關係了。[58]」作者非常清楚語文與文學及社會變遷有著緊密的連結。也因此，他再述及台灣自日本統治以來，語言方面所發生的變化：

> 我臺受轄以來，已經過了三十年了。其間社會上的變換，**言語也隨之而變**。然現在的文明已脫離封建時代的因習，就是**文學上也要求着民眾化**，所以中世紀以上的**古文在那時也是時文**，那到了這時也不通用，原來，又換了一個白話文了。[59]（粗體：引用者）

此文雖聚焦於「台灣話」的改革，但從「**文學上也要求著民眾化**」之言，可知其改革的目標之一亦在於文學的改造。而面對著「白話文」時代的來臨，連溫卿提倡：「我們台灣人須要改造我們的台灣話，以應社會上生活的要求[60]」。於是，〈將來之臺灣話〉中甚且較其他幾篇更詳實地考察了「台灣語言」的樣貌：

> 臺灣的言語，先受了宗教上用**羅馬字**宣傳的影響，言語學雖有些進步，然民眾皆以那是有宗教的臭味，却不感謝那的努力，這是錯的。事實上言語學上只可以言語學上觀之方可。後來受了日本教育的影響，及交通敏捷的緣故，臺灣言語每說了一句便有**新名詞**在，臺灣的住民有泉州

57 請參考筆者，「第五章」，〈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湾エスペラント運動研究〉（日本東京：一橋大學言語社會研究科博士論文，2016）。
58 連溫卿，〈將來之臺灣話〉，《臺灣民報》2卷20期，1924.10.11，頁14。
59 連溫卿，〈將來之臺灣話〉（續），《臺灣民報》3卷4期，1925.02.01，頁14。
60 連溫卿，〈將來之臺灣話〉（續前），《臺灣民報》2卷21期，1924.10.21，頁14。

> 人、漳州人、客人，發音各殊，若以**新名詞飜譯起來，泉人則以泉音、漳人以漳音、客人以客音譯之，一個名詞遂變作三個**。又臺灣是孤懸海中，**住民雖是從中國渡來**，因為氣候風土各異的緣故，**發音上未必能與本土的人們相同**，不但如是**就是拿南北兩個中國所飜譯的新名詞，來比較，一定也是不同的**。[61]（粗體：引用者）

1920年代的世界語者，多有將民族語言「羅馬字化」以作為邁向世界的第一步之思考。因此連溫卿在思考台灣話時，也未將羅馬字的可能性排除，且先提及傳教士的貢獻，繼而提醒我們當時的越來越多的「新名詞」＝「日語借詞」，成為台灣話的新詞彙之現象，而台人各族群各以自己的母語發音；也因此未能統一。且連溫卿提到台灣話雖源於中國，卻也因歷史變遷而形塑出獨特性，有了新的面貌，並與中國的語言走向相異的現實。也因台灣各地仍存在漳州話、泉州話、潮州話等腔調，故有統一的必要，因此提出標準化的具體對策：

> **第一要考究音韻學以削除假字、第二要一個標準的發音**、若沒有這麼、要知道一個名詞、須辨續三四個同樣異音的名詞、這是怎麼不便呢、（中略）、**第三要立一個文法**、沒有文法、臺灣語像野獸一樣、任他縱意疾驅山野、使臺灣人們、必竭力追逐，猶恐怕不能摩提風影、若別的人們我恐拿這個臺灣話、去比那棲在深林中兇惡的獅虎、說沒有曾受過文化的東西啦、野蠻野蠻、其實臺灣話不是沒有文法、你們想々、**難道中國有中國話、而引他系統的臺灣人、就沒有和他相似的文法麼**？[62]（粗體、底線：引用者）

此文對台灣話的建設，提出三個具體方案，即：**①要考究音韻學以削除假字，②要一個標準的發音，③要立一個文法**。要之，他認為台灣話其實是有文

61 同註59，頁14。
62 同註59，頁15。

法的，若能加以整理，也可促進語彙的歸納。而「**難道中國有中國話、而引他系統的臺灣人、就沒有和他相似的文法麼**」之疑問，看來是與引介中國白話文者的對話，甚且更是強調著，漢語體系的文法原就相近，台灣話與中國話有相近的文法，也因此我們讀到前引黃朝琴等人的文章時，認為它們幾乎是中國白話文。而從這句話也能看出，1920年代初期，新文學運動的各種主張當中，尤其對於「台灣話」的認知，知識分子之間已有強烈落差；此點稍後再述。而在文章後段，連溫卿又強調，「要社會發達，言語問題是很重大的[63]」，並在最後一節提出暫定的台灣語文法整理方案。

陳芳明認為連溫卿的「台灣話文論」影響至1930年代，論其達到提倡「台灣民族主義」的效果。[64] 蕭阿勤更精確地論及，政治運動或社會運動幾乎被鎮壓的1930年代初期，台灣的知識分子轉進文化運動，其中最具象徵的即是「鄉土文學及台灣話文論戰」；論戰中，文學語言與文字改革成為討論中心之外，「台灣文化的特殊性」也成為論戰的焦點。[65] 那麼，重看新文學運動初期的〈將來之臺灣話〉，其目標是將台灣話近代化並創造台灣文化的特殊性，卻無法在當時得到實踐，但其理論被1930年代的「台灣話文」推動者加以具體化，欲重新推動「台灣新文學」的獨特發展。

我們從黃呈聰與黃朝琴受日本言文一致運動影響提出的言文一致體之書寫倡議，或者蔡培火受植村正久與田川大吉郎的鼓勵而推動羅馬字普及、張梗引進以日本與西洋文藝思潮來改革舊小說，以及連溫卿從世界語運動得到經驗來對台灣話的改革提出具體方案，在在看出新文學運動初期的討論，是相當具世界性視野與多元性觀點的。要到張我軍的論述出現，新文學運動的語文改革方向才急速地幾乎完全走向模仿中國白話文的路線，以下論之。

三、「言文『不』一致」的起點：張我軍〈新文學運動的意義〉

《臺灣民報》中最早將中國白話文介紹到台灣的並不是張我軍。在

63 同註59，頁15。
64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11），頁62-63。
65 蕭阿勤，《重構台灣　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12），頁86。

1923年即有許秀湖（許乃昌）寄自南京的〈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過去現在和將來〉（1923.07.23），介紹了胡適的「八不主義」及陳獨秀的「三大主義」。楊雲萍認為這是介紹中國白話文運動的整個情形到台灣的最初一篇。[66] 但將中國的新文學運動最完整也最積極地引入台灣，並且最受討論的即是張我軍，其發表在《臺灣民報》的幾篇文章，包括〈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1924.04.21）、〈糟糕的臺灣文學界〉（1924.11.21）、〈為臺灣文學界一哭〉（1924.12.11）、〈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欉中的破舊殿堂〉（1925.01.01）、〈絕無僅有的擊鉢吟的意義〉（1925.01.01）、〈揭破悶葫蘆〉（1925.01.21）、〈文學革命運動以來〉（1925.02.21）、〈新文學運動的意義〉（1925.08.26）[67] 等；尤其〈新文學運動的意義〉提出了實質的改革要點，即「白話文的建設」與「台灣語言的改造」。

關於中國的「文學革命」，中國研究者黃曉蕾所提出了新的觀察：

> 《新青年》及其倡導的文學革命，在現代文學史和思想文化史中的研究文獻已是汗牛充棟，對各自學科的意義和影響更是毋贅述，但是**《新青年》及其倡導的國語文學，在現代漢語尤其是現代漢語標準語形成中的意義和作用，卻在某種程度上（至少和前幾個研究領域相比）被低估和忽視**。[68]（粗體：引用者）

也就是說，「**國語文學**」或「白話文學」的提倡，伴隨而來的其實是「**現代漢語**」、「**現代漢語標準語**」的形成。黃曉蕾對中國學術的提醒，也非常值得台灣學界的參考，包括前述幾篇導火線文章之於語文改革上的歷史意義。進一步而言，台灣新文學運動初始，尤其張我軍的中國白話文之引進，所伴隨而來的關於「國語」的建構，之於台灣，在黃曉蕾所謂「現代漢語」或「標準語

---

66 楊雲萍，〈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回顧〉，《臺灣文化》1卷1期，頁12。

67 其他另有〈文學革命運動以來〉（1925.02.21）、〈研究新文學應讀甚麼書〉、〈中國國語文作法導言〉等多篇於1920年代引介中國白話文的相關文章發表於《臺灣民報》。請參考許俊雅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16　張我軍》（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03），頁41-47。

68 黃曉蕾，《民國時期語言政策研究》，頁94。

的形成」之意義上，恐怕是「中國話」與「台灣話」在台灣的標準化之角力。以下詳論。

（一）「白話文學的建設」與早夭的「台灣白話文學」

本論文在前一節整理了「新文學運動」之前以台灣「土語」為主體所被書寫下來的種種文字，說明了新文學運動之前，台灣在官方的辭書整理或民間流傳的文獻中，已看見屬於台灣的「白話文」之雛型。[69] 而在「言文一致」的概念被引進台灣初始，雖有以「漢文」或「羅馬字」等不同方式提倡的「白話文」之改革意見，但除了蔡培火以日文書寫的論述，其他文章的書寫「文體」，卻也如施文杞與林耕餘等人批評的：「台灣人做的那種白話文，真是弄笑話！他們**做那種**台灣式的白話文，要是他們**後日**到中國來，豈不還要習中國的白話文嗎？」僅管兩人的批判文體，也相當「台灣式」。

根據日本學者山口守的考察，1938年張我軍曾以「張迷生」之名參與電影《東洋和平之路》的製作，有演員曾回憶三名中國臨時演員當時均聽不懂張我軍的北京話。[70] 亦即，將中國白話文引入台灣，且長期居住北京，但張我軍的北京話說得並不流暢。而這位在1920年代初期留學北京、北京話其實（恐怕更）不流暢，卻積極將中國白話文與中國「國語文學」引進台灣的張我軍，其書寫的文體，也流露濃濃的台灣話者的行文特色。

當然，張我軍也為強調中國白話文的簡易度而反問，「若說不會說中國語的人就不能以中國語寫作詩文，然則能以古文寫作詩文的都是會話古話的嗎？」[71] 亦即，張我軍認為，台灣人不會講中國話，並無礙於學習書寫中國白話文。更精確一點地說，**「台灣話」這個語言本身和它要如何達到言文一致，完全不在張我軍的考量**；因為其目的乃是以中國白話文取代其認為若是繼續發

69 除了官方與民間留下的文獻，翁聖峰在《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中也整理出不少新文學運動之前或期間一些以台灣話書寫的「白話文」，但因不過期間或需要有不同稱呼，如「平易文」（頁109）、「言文一致體」（頁117）、「簡易時文」（頁141）、「台灣式白話文」（頁209）等多種。

70 山口守，〈北京時期的張我軍：被文化與政治夾擊的主體性〉，《台灣文學研究集刊》20期（2017.02），頁74-75。

71 張我軍，〈新文學運動的意義〉，《臺灣民報》67號，頁20。

展，也無法脫離幼稚低級的台灣話文。也因此，第二項要點為「台灣語言的改造」，即改造幼稚低級的台灣話，使其足以成為「新文學」的載體。改造之具體，將在下一小節論析。在此先討論，究竟為何張我軍在這個時間點，要大力推行「建設白話文學」？先看看他在《臺灣民報》發表的〈糟糕的臺灣文學界〉，所提出的最直接的批評：

> 這幾年臺灣的文學界要算是熱鬧極了！差不多是有史以來的盛況。試看各地詩會之多，詩翁、詩伯也到處皆是，一般人對於文學也興致勃勃。（中略）他們不但不能脫却舊文學的迷夢，踏入新文學的路上，簡直懂得文學是甚麼的人，恐百中不能求一，（照這樣結論起來，他們死守古典主義也難怪的。老實說一句，他們或許不自知其是守在古典主義罷。）試問一問，他們為甚麼要做詩？詩是什麼？（我所以拿詩來做例者，是現在——歷來也許都是如此——臺灣的文學，除詩之外，似乎再沒有別種文學了。如小說、戲曲等不曾看見，所以現在臺灣差不多詩就是文學，文學就是詩了，所以拿詩來做例，以下都是如此。）[72]

對於台灣的文學只有「詩」的批判，與他的前一篇〈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中謂：「臺灣的詩文等，從不見過真正有文學價值的，且又不思改革，又在糞裏滾來滾去，滾到百年千年，也只是滾得一篇臭糞。[73]」，以及另一篇〈絕無僅有的擊鉢吟的意義〉謂：「我們反對做舊詩，我們尤其反對擊鉢吟。我們反對做舊詩是舊詩有許多的限制、規則、束縛，而背文學的原理[74]」等主張，大致相同。

首先，就形式而言，張我軍反對的是「**文類的單一**」：僅有詩，且僅有舊漢詩。這當然是出於其對當時台灣文學界，尤其是古典文學的不夠理解與所持

---

72 張我軍，〈糟糕的臺灣文學界〉（原載於《臺灣民報》2卷24期，1924.11.21），轉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5・文獻資料選集》，頁63、64-65。

73 張我軍，〈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原載於《臺灣民報》2卷7期，1924.04.21），轉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5・文獻資料選集》，頁56-57。

74 張我軍，〈絕無僅有的擊鉢吟的意義〉（原載於《臺灣民報》3卷2期，1925.01.11），轉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5・文獻資料選集》，頁92。

之偏見，甚且他也完全無視於流傳台灣民間的白話文學與基督教會中的白話字文學；其中不僅有故事、戲劇，甚至有現代小說的發展。而張對台灣古典詩的批判，認為台灣的舊漢詩多不關注於現實社會，則出自其接受胡適所言「中國文學必須是寫實的[75]」的觀點，以及他認同中國知識分子於五四運動初期首度以西方理論來改革中國文學，並詮釋中國文學應有的內涵等背景[76]之反映。關於此點，稍後將再詳論。而張我軍在〈為臺灣文學界一哭〉一文中，又反駁了「提倡新文學、鼓吹新體詩的人，便都說漢文可廢[77]（底線：引用者）」的論調與誤解。換句話說，張我軍「並非主張廢漢文」，他希望漢文存留，但認為以漢文書寫，應要創造出從種種束縛中解脫出來、更符合時代的「**新文體**」與「**新文類**」。而這點與前述張梗在〈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中提及台灣文壇看不到較新體式的小說或戲曲、以及小說應該要有科學意義的內涵，其實有雷同之處。更精確地說，張我軍並非反對詩或舊文學，而是他認為當下的**台灣文壇所謂的「文學」僅存著「形式」的複製**，而失去了如西方文學所強調的內在意涵。

在〈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欉中的破舊殿堂〉說得更清楚了。張在文章開頭即表明：「臺灣文學乃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流」、「於是中國舊文學的孽種，暗暗於敗草欉中留下一座小小的殿堂——破舊的——以苟延其殘喘，這就是臺灣的舊文學」。如此發言，突顯了張的文學論乃立論於中國中心觀的基礎；無論是台灣的舊文學或未來將發展的台灣新文學，都延伸自中國文學。而趨動張我軍如此觀點者，想然是當時多數文人皆具有的祖國嚮往與漢文化認同，且張又是日治以來，首批親身見證中國經歷「文學革命」的主要人物，於是便有了「只是我不敢以文學革命軍的大將自居，不過做一個導路小卒，引率文學革命軍到臺灣來，並且替它吶喊助攻罷了」[78]的使命。於是，張我軍成了最積極地「中國文學革命」的仲介者，並比許乃昌更詳實地介紹了胡適的「八不主

75 周策縱原著，楊默夫編譯，《五四運動史》（台北：龍田出版社，1981.01），頁411。
76 同註75。
77 張我軍，〈為臺灣的文學界一哭〉（原載於《臺灣民報》2卷26期，1924.12.11），轉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5・文獻資料選集》，頁70。
78 張我軍，〈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欉中的破舊殿堂〉（原載於《臺灣民報》3卷1期，1925.01.01），轉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5・文獻資料選集》，頁81、82。

義」。從這個脈絡往下看〈新文學運動的意義〉，就更明瞭張我軍想要建設怎樣的「白話文學」。文章開頭即如此批判：

> 現在的臺灣沒有文學，歷來也許都沒有文學吧。有之，也不過是些假文學、死文學，而沒有真文學、活文學。胡適先生說，現在中國的舊派文學不值得一駁，我想現在——以至歷來——臺灣的舊文學**檢直**不值得一笑。[79]（粗體：引用者，請參考註釋）

張提及「假文學」、「死文學」，以及「真文學」、「活文學」；且完全否定了所有曾存在於台灣的文學。然而，其於此段之後又謂：「我們為什麼愛讀木蘭辭和孔雀東南飛呢？因為這二首詩是用白話做的。為什麼愛讀陶淵明的詩和李後主做的詞呢？因為他們的詩詞是用白話做的。為什麼愛杜甫的石壕吏兵車行諸詩呢？因為他們都是用白話做的。為什麼不愛韓愈的南山呢？因為他用的是死字死話。……」[80] 從這裡的發言，即可見張我軍的「白話觀」完全接受自胡適。胡適後來將其對於白話文學的論點加以系統化整理成《白話文學史》一書，於1928年出版；其為了證明中國的「白話」並非突然形成，將歷史溯自唐朝以前，包括漢朝的民謠、樂府或民歌，以及如《孔雀東南飛》這樣的故事詩。[81] 然而，就結構與音律而言，這些遠古的平民文學卻也非吾人今日所認知的「白話」，甚至是1920年代慣用漢文、喜用典故的台灣文壇，恐怕也不將它們視為全然的白話，且今之讀者也未必不愛張認為是「死字死話」的韓愈〈南山〉。

換句話說，張我軍認為台灣文壇僅有「文類的單一」，舊詩，且僅存著「形式」的複製，可說是直接將胡適對中國舊文學的批評，全盤套用在這個他們為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流」的台灣文學。甚且，如本論文前一節曾引自王育

---

79 張我軍，〈新文學運動的意義〉，《臺灣民報》67號，頁19。「臺灣的舊文學**檢直**不值得一笑」中的「檢直」之用詞，與其說是「簡直」之誤植，倒不如說張我軍以台語的「kiám-tshái」（或許之意）思考，他知道「kiám-tshái」的kiám寫成「檢」，卻不知tshái用哪個字好，而假借了簡直的直。這種過渡期的假用與混用，常見於當時的文章。

80 張我軍，〈新文學運動的意義〉，《臺灣民報》67號，頁19。

81 請參考胡適，《白話文學史》（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2）。

德反駁尾崎秀真謂清代無台灣文學，並提出清代就存在著台灣文學，即流傳於民間的「歌仔冊」之論，也是張我軍所否定的。矛盾的是，張肯定中國古代的「民歌」並視之為白話，卻對台灣民間的歌仔冊視而不見。且雖歌仔冊與擊缽吟式的漢詩在形式全然不同，但張亦與當時代的台灣文人一樣，幾乎不將「歌仔冊」這樣的民間文學視為「文學」；尤其歌仔冊多以不科學的「假借字」來書寫台語白話，這更是張我軍認為需要改革的。這一點，於下一小節論析。

而從首段即提到胡適對中國的舊派文學之批判，以及文章接下來又重申了胡適的「八不主義」（於〈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欉中的破舊殿堂〉即已詳細介紹；後來的〈文學革命運動以來〉也再推舉胡適觀點），且大篇幅地再引用胡適的論述：

> 我們現在談新文學的運動，至少有二個要點：
> 1 白話文學的建設。
> 2 臺灣語言的改造。
> 我這二條是從胡適的「建設新文學」的「**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出來的。他說：「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能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真正國語……」我們主張以後全用白話文作文學的器具，**我所說的白話文就是中國的國語文**。[82]（粗體：引用者）

可以說，張我軍的觀點與提倡，幾乎是全盤接收自胡適；並且，國語（語言）和文學的關係乃是相輔相成。而正如中國的胡適研究者劉東方在討論胡適文體理論的具體內涵時，強調「語言是文體的本質，而文體類型則是其外在顯現」[83]，而胡適要建構的「文體」，正是白話文——中國的國語文。

而正如前引〈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欉中的破舊殿堂〉開頭所提，「臺灣

82 張我軍，〈新文學運動的意義〉，《臺灣民報》67號，頁19。胡適該文原題為〈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轉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5・文獻資料選集》，頁414。

83 劉東方，〈導言〉，《“五四”時期胡適的文體理論》（中國山東：齊魯書社，2007.11）頁20。

文學乃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流」，張我軍認為作為中國文學一支流的台灣文學，在面對新時代的來臨時，於寫作的工具上，即一個新的「文體」，則應該與中國合流。那麼，換句話說，中國的「文學革命」帶來的「**文學的國語**」——即「**統一規格的書寫**」，讓散落各地的「相異口語」得到「**標準化**」；這個標準化，基本上就是「中國白話文」的建設。然而，隨著整個充滿異質文化的中國走向統一化的建構，一個全新的「中國白話文」之建設，在一開始也就已經朝向「**言文『不』一致」，即一個文體根本無法如實表現各地語言**的方向前進。甚且，張我軍將前述幾篇「導火線」文章裡以土語出發的「白話文」之倡議，完全地導向以「中國白話文」為基調的發展方向；那麼，這個引自中國的白話文，當然無法如實地對應「台灣話」。

簡言之，〈新文學運動的意義〉所提倡的是，因為台灣作為中國的一個地方，因此台灣語言也必須進行「**得以規範於中國統一語文當中**」的改革。所以張我軍強調：「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他是直接在「**台灣等同於中國**」的思考脈絡下在台灣推動中國白話文，以此建設台灣的新文學；而這個論述，這個在中國本身就無法滿足於全國各地語文的言文一致的中國白話文論述，便導致了台灣新文學自此走向「**言文『不』一致**」的書寫與文體樣貌。

本文前引陳端明謂：「然今之中國豁然覺醒，久用**白話文**，以期**言文一致**」，足見台灣知識分子對中國白話文於言文一致的實踐上之誤判。因為言文一致若真正落實，則將造成「地方方言的分裂」[84]。換言之，張我軍的新文學運動之提案，書寫中國白話文，原是為了符合「言文一致」的思想，但在中國發展起來早已有違「言文一致」的主張核心。那麼，既不是為了言文一致，則「台灣話」也根本就不在張我軍的考量。

（二）「台灣語言的改造」：「土語」不該成為文學語言

雖然「台灣話」本就不在張我軍的新文學脈絡之考量，但島內在張我軍的

84 金文京，〈陳培豊『日本統治と植民地漢文—台湾における漢文の境界と想像—』〉，《歷史学研究》917期（2014.04），頁56。

白話文學引入之前，即有前述的本土白話文的發展，諸多台灣式的白話文的作品也刊於《臺灣民報》，因此引來施文杞、林耕餘等人的批判。有鑑於此，張我軍有必要更積極的提出回應與具體的實行方案。只是，張我軍對「漢語」的理解確是極為淺薄，中國白話文的基礎立於北方的語言，而北方的語言其共通性較大，但南方的語言，如福建話、廣東話，甚至是客家話或近廈門方言的台灣話，幾乎與北京話無法北京話相通，其間的隔閡大於英語和德語的差異。[85] 年輕的張我軍，憑著強烈的祖國文化認同與熱情使命，卻全然未留意台灣語文有其特殊性而欲將之改造，有其在當時代的盲點，但後來台灣新文學卻也走向模仿中國白話文之路，實也顯示著當時台灣人的侷限視野。

那麼，張我軍認為台灣語言要怎樣進行「得以規範於中國統一語文當中」的改革？〈新文學運動的意義〉提出的第二項要點，「台灣語言的改造」，其實際如何？他的改革意見，又是如何影響台灣新文學後來的走向？〈新文學運動的意義〉一文，是如此看待台灣話的：

> 「臺灣話中有沒有文字來表現？臺灣話有文學的價值沒有？臺灣話合理不合理？」實在，我們日常所用的話，十分差不多占九分**沒有相當的文字**。那是因為我們的話是**土話**，是沒有文字的**下級話**，是大多數占了**不合理的話**啦。所以**沒有文學的價值**，已是無可疑的了。[86]（粗體：引用者）

張我軍的這些「反問」，其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他認為台灣話是「**土話**」、「**沒有文字的下級話**」、「**不合理的話**」。張我軍此言，於今的確令人吃驚，但回到當時知識分子面對新時代的衝擊，實可理解其亟欲吸取現代文明與科學知識的出發點與使命。然而，也由於這三個形容詞的出現，此文大概可視為新文學運動中，首度將台灣話置於「低階語言」（Low language）的論

85 王育德著，呂美親編譯，〈同情與理解的距離——尾崎秀樹著《近代文學傷痕》〉，《漂泊的民族王育德選集》，頁240。相關研究可參考王育德論文〈中国五大方言の分裂年代の言語年代学的試探〉，《言語研究》38期（1960.09），頁33-105。

86 張我軍，〈新文學運動的意義〉，《臺灣民報》67號，頁20。

述；而低階語言及其使用者，在此時間點也開始處於被支配（dominated）和被剝削的位置。[87]

「土話」、「沒有文字的下級話」、「不合理的話」，這三個看似不同內涵的詞，一個共通點即在於**台灣話的「文字」尚未建構**，沒有文字，所以還是「土話」，所以語言位階處於「下級」，所以不合現代語言的「理論」，因為詞彙和文法都被妥善地加以整理與規範。正如胡適所提的中國文學革命之「八不主義」，其第三項即是「**須講求文法**」。而「文法」的概念來自西方，其乃是透過科學的方式來將語言加以系統化地整理出其規則，提供一套規範用以學習。也正如前引之連溫卿所言：「沒有文法、臺灣語像野獸一樣」。因此，客觀來說，張我軍當時的發言，既是接受胡適觀點，似乎也是站在現代的、科學的角度，來認定台灣話是「**土話**」——即非已受到規範化的「國語」一般；是「**沒有文字的下級話**」——許多語彙的確難以文字表現，不符現代語文之要求；是「**不合理的話**」——文法仍未整理，書寫時未能展現其現代式的邏輯理路；那麼，當然無法成就其認為的「文學」——即「**沒有文學的價值**」。而若要有文學價值，那台灣話必須要改造。準此，1930年代的台灣話文提倡者對於台灣話改造的種種建議，反而是應該更早被廣為討論的。然而，正如本文第二節也提及的總督府方面的台灣話整理、同時代的歌仔冊白話文學與羅馬字的白話字文學，以及前述台灣語文與北方語言的差異等，幾乎都不在張我軍或同時代文人的掌握之中。因此，其所提出的台灣話改造論，當然也是建立在偏見、誤判，甚且是無知之上。

那麼，張我軍提出的台灣話改造之「方法論」之具體為何？他認為是：「須多讀中國的以白話文寫作的詩文」，而在「技術層面」則是將這些詩文以「**孔子白**」[88]唸出。什麼是「**孔子白**」？孔子白即**台語**的「**文言音**」；而事實上「文言音」的閱讀對讀過「漢文」的人也不難，漢文的習得也都以「文言音」記誦。而這也再印證了筆者在前述所言，張我軍「並非主張廢漢文」，但

87 這裡引用的低階語言論述，引自洪惟仁，〈台灣的語言政策何去何從〉，施正鋒編，《各國語言政策——多元文化與族群平等》（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12），頁502-503。

88 張我軍，〈新文學運動的意義〉，《臺灣民報》67號，頁21。

認為以漢文書寫，應要創造出從種種束縛中解脫出來、更符合時代的「**新文體**」與「**新文類**」。而他的取徑是中國白話文。

問題就在於「改造」，自此，台灣話開始被如何地「改造」了？

首位研究台灣話並編著多部台語字辭典的岩崎敬太郎[89]，在1916年出版的《新撰日臺言語集》中即提出台語的**標記方式**有4種：①音義皆能表現；②**只能表現意義**；③只能表現語音；④音義皆無法表現。其中的第②點，岩崎舉出「**讚美**（o-ló）」、「**如此**（án-ni）」、「**事情**（tāi-tsì）」、「**羞恥**（kiàn-siàu）」、「**賢人**（gâu-lâng）」等例詞，來說明像這類僅表現意義的漢字與其發音的差異[90]；且書中多可見如「**尚未**（iáu-bē）」、「**何處**（toh-loh）」、「**時候**（sî-tsūn）」等例[91]。首先，「讚美」、「如此」、「事情」、「羞恥」、「賢人」、「茂茂」、「尚未」「何處」等「漢語詞」，對當時已習得漢文，皆可能也讀了不少明清以降的章回小說的台灣人應不陌生。

重點是，原本是「漢字與發音有所差異」的「白話音」或「訓讀」之閱讀體驗，現在張我軍建議以「**孔子白**」（文言音）來讀了。那麼，會出現什麼狀況？以上面的例子來說，即：**讚美**＝「o-ló」→「tsàn-bí」；**如此**＝「án-ni」→「jû-tshú」；**事情**＝「tāi-tsì」→「sū-tsîng」；**羞恥**=「kiàn-siàu」→「siu-thí」；**賢人**=「gâu-lâng」→「hiân-jîn」；**尚未**=「iáu-bē」→「siōng-bī」；**何處**=「toh-loh」「hô-tshù」；**時候**=「sî-tsūn」→「sî-hiō」。

也就是說，台灣話在新文學運動初期，原應嘗試陳端明提倡的「日用文」，或者黃呈聰及黃朝琴提出的所謂「言文一致體」的「言文一致」等，甚至是蔡培火的白話字普及，或者連溫卿的台灣話改造建議，直接從以「土語」漢文著手改革。但這些方向隨即被張我軍轉了彎，導致無法走向真正地「**我手寫我口**」。如果可以真正落實「言文一致」，則：讚美→**呵咾**；如此→**按呢**；

89 岩崎敬太郎（1880-1934），首位研究台語的日本學者，1896年擔任陸軍省通譯官而來台，歿於台灣。編著《台灣語發音獨習》、《埤圳用語》、《新撰日臺言語集》、《專賣局臺灣語典》、《羅馬字發音式臺灣語典》等書。參考黃馨儀，〈台湾語表記論と植民地台湾 ── 教会ローマ字と漢字から見る ── 〉（日本東京：一橋大學言語社會學研究科博士論文，2010），頁40-41。

90 岩崎敬太郎，《新撰日臺言語集》（台北：新撰日臺言語集發行所，1916.12），頁40-41。羅馬字為筆者按其所標的片假名發音所加。

91 岩崎敬太郎，《新撰日臺言語集》，頁63。岩崎的另一部《羅馬字發音式　臺灣語典》（台北：新高堂書店，1922.08），例文皆附教會羅馬字，內容與《新撰日臺言語集》類似。

事情→**代誌**；羞恥→**見笑**；賢人→**勢人**；尚未→**猶未**；何處→**佗位**；時候→**時陣**；而不是如前一段所呈現的「**言文『不』一致**」的局面，得要到1930年代的台灣話文運動，才重新聚焦在用字的討論。

而這個以「**孔子白**」閱讀的方法之實行，影響是極大的。從1920年代中國白話文引進乃至1930年代後期，總督府從廢漢文欄又轉而因應與中國的戰爭所推行的白話文研究，甚且到1940年代以後，都持續被延用。例如1935年劉增銓在《語苑》發表〈白話文用語の研究〉，為的即是讓台人更順利「閱讀」中國白話文：

Tsé-kò tong-si　　sī ngóo tíng hí-huan tik
這個東西、是我頂喜歡的。
Tík-ping tsū-jiân put-siáu　　tān-sī bùt-iú kì-lùt　　put-iàu hāi-phànn
敵兵自然不少但是沒有紀律不要害怕。
Thann it-kò guàt　　iā-tsiūiú it-pik lâi khuài　　tsiân tik tsìn-hāng
他一個月，也就有一百來塊錢的進項。[92]

換句話說，在台灣話的「口語」在還未及被好好正視並加以標準化時，中國白話文取而代之成為台灣話的新「書面語」，並被以台語的「孔子白」唸出，而逐漸成為台灣新文學運動中不斷被寫出來的「新口語」。這種全然以「孔子白」的閱讀方式，果真讓中國白話文宛如「**另一種文言文**」。也難怪鄭坤五於1942年都還要為此提出反駁的論調：

> 「馬上」、「我們」、「她」、「老婆」，我總認為他是中國話。就是中國人，無騎馬者，妄說馬上；對妙齡之愛妻叫老婆，我也不服。況兼咱大家是臺灣人，**用中國方言，強化臺灣白話**，動不動便「馬上」、「我們」、「她」、「老婆」，實在我不感心。[93]

鄭氏此文雖稍留有文言之筆，卻也是全然的台語白話文其中一種文體風

92　劉增銓，〈白話文用語の研究〉，《語苑》28卷5期（1935.11），頁94（原標音為片假名，台羅標音為筆者所加）。

93　坤五，〈我也對舟揖説幾句〉（原載於《南方》146期，1942.02.01）；轉引自翁聖峰，《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頁207。

格。「就是（tsiū-sī）」即「就算是／即便是」；「況兼（hóng-khiam）」即何況之意；「實在（si̍t-tsāi）」置於句前，即「說實在地／說真的」之意；「感心（kám-sim）」為日語借詞（亦是台語），深刻感同於心之意。其餘或以文言音雜白話音讀之。

文中所言，台人的書寫是模仿中國語文，來**「強化」台灣白話，即「改造」台灣白話**，這其實難以打動台灣讀者的內心。而**「強化」台灣白話**，事實上就是**把原來被認為「沒有文字」的「土語」詞彙（的文字化之可能性）直接排除**，如此一來，前述張我軍引胡適所言：「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能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真正國語**」，則「土語」的台灣話，則完全沒有機會成就文學，也完全被排除於成為「語言」（國語）的可能性了。換句話說，這個結果使得原應走向「言文一致」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在張我軍以「台灣為中國文學的一支流」，因此「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來闡述「新文學運動的意義」，並且提出排除「土語」書寫的「台灣語言的改造」論之後，正式地走向「言文『不』一致」的局面。

而以「孔子白」閱讀的「言文『不』一致」的新文學運動下的新文體，除了保留既有的官方字辭典中較書面形式且與漢語詞相通的台語「書面文」之外，再增加了許多「中國白話文」的詞彙，成為台灣的白話文之「新書面語」，而使得現當代的我們，尤其對於文言音、白話音或者訓讀等台語漢字發音難以掌握的我們，在閱讀新文學運動的文章時，往往僅認定其為「中國白話文」。

四、小結：新書面語、新口語、「新文學」

黃美娥認為，舊文人在文體上的嘗試與文學改革的觀點上，亦具有積極與創新的性格。[94] 而翁聖峰在新舊文學論爭的新論中，也將新文學運動中參與論爭的舊文人之觀點加以整理。甚且我們可以發現，後來提倡更符合「言文一

94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4.02），頁31-79。

致」主張、更積極想以科學方式整理台灣話使其具文法規則與標準化者，即倡議「台灣話文」的主要人物，都曾是寫作大量漢詩的作者，例如鄭坤五、連雅堂、黃純青、黃石輝等人都支持台灣話文，他們也留下許多古典詩作品。換句話說，這些漢文人在不同的時間點，隨著時代與思潮的影響，承續著漢文的傳統，打造出以漢文為載體、以新文學之姿顯現的新文體。而這進行約莫四分之一世紀的「新舊文學」之論爭、實驗與實踐，台灣人發展出自己獨特的白話文面貌，筆者以時人所稱而命其為「台灣白話文」。[95] 它在各個時期、各種文類中皆因形成背景不同而存在著細微不同的面貌，以及可細細劃分的文體。即便如此，從諸多文獻與論述等例證可知，這些文章卻是以台語的文言音、白話音或訓讀被學習、閱讀與書寫。

另外，本論文也藉由日人編纂的語學書、具公共性格的漢文報紙，以及流傳民間的歌仔冊等，來確認早在中國白話文被引入之前，台灣早已具預備了極為實用的工具與豐富的材料，提供台灣的新文學運動在書面語及口語的書寫嘗試與改革的基礎。而正因台灣白話文的流變極為複雜，為了找出台灣新文學運動於初期的語文改革時，究竟在哪個環節促成了台灣白話文的「言文『不』一致」之局面，本文回到了新文學運動的原點，以劉捷在1936年發表的〈臺灣文學の史的考察〉一文中，所列舉的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黃朝琴〈漢文改革論〉、蔡培火〈新臺灣の建設と羅馬字〉、張梗〈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連溫卿〈將來之臺灣話〉、張我軍〈新文學運動的意義〉六篇1920年代運動初期相關的「導火線文章」，作為討論中心，嘗試論析運動初期，知識分子們對於台灣新文學的主張與實際的語文改革提案，並重新定義它們在台灣新文學運動開展初期中的位置。

簡言之，黃呈聰與黃朝琴受日本言文一致運動影響提出的言文一致體之書寫倡議，而蔡培火受植村正久與田川大吉郎的鼓勵而推動羅馬字普及，張梗則

95 詳細請參考筆者，〈訓讀、模仿、創造——「台灣白話文」：論日本時代台灣近代文體的形成與樣貌〉，《賴和・台灣魂的迴盪 2014彰化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55-420。而回到台灣話的語境去考察當時的白話文面貌，也才能相應共產主義者林木順之子林炳炎（1944-）老先生，為何強調戰前報紙的漢文版可謂「台語版」。請參考林炳炎，《林木順與台灣共產黨的創立》（台北：三民書局，2013.02），頁79。又，氏謂林木順寫給莫斯科的建黨經過報告是以台語來寫，但上海的東方局看不懂，只好全文直接送莫斯科存檔。

引進以日本與西洋文藝思潮來改革舊小說，連溫卿則因世界語運動的經驗來對台灣話的改革提出具體方案。這些新文學運動初期的討論，不僅極具世界性視野，觀點也相當多元。而後，張我軍具體地將台灣文學定調為中國文學的一支流，並將這個因中國的「文學革命」帶來的標準化過後的「**文學的國語**」——「中國白話文」導入台灣。他否定了「土語」可成就「文學」的可能性，建議「須多讀中國的以白話文寫作的詩文」，並將這些詩文以台語文言音「孔子白」唸出。大量的中國白話文進到原本發展中的「本土白話文」，成為它的「**新書面語**」，且取代台灣的「口語」（土語）之發展，導致黃呈聰及黃朝琴所提的「言文一致體」之發展方向被迅速轉換跑道，而形成了無法走向真正「我手寫我口」的「言文『不』一致」之面貌。

1920年代新文學運動初期於台灣產出的白話文體，現今往往被視為全然的「中國白話文」之現象，其實也是因為它猶在改革途中，且較多程度保留著如「漢語」之共通性；另一方面，源自於日語借詞的「新漢語」，更扮演了關鍵角色。如中國學者黃曉蕾與旅日中國研究者陳力衛的整理，中國白話文在發展初期，為了翻譯新的語詞，也大量直接使用日語的翻譯，這些「和製漢語」成了**新的中國詞彙**。[96] 而台灣的「新語」，除了受到借自日本新漢語的中國白話文之影響，更多的或許是殖民地時期的直接接收與使用。也正是在五四運動以降，中國各地的語言＝「口語」開始被進行了全國性規模的改造，走向統一。[97] 1920年代初期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即在此時，赴上了這個中國的語文改革列車，大量的中國白話文進到台灣人的書寫機制，台灣人的「土語」書寫被這個以張我軍建議以「孔子白」來閱讀的「**新書面語**」所取代，且因文字書寫而加以內化出台灣的「**新口語**」。「**新書面語**」的形成，造就台灣話的「**新口語**」之誕生，而台灣人在創作時，除了原有的自我的語言及文化特色的呈現，也運用了這些「新書面語」和「新口語」來寫作，台灣的「新文學」，自此開展，並走出我們所看到的面貌。

96 黃曉蕾，《民國時期語言政策研究》，頁44-52。陳力衛，〈和製漢語と中国語〉，《比較日本学教育研究センター研究年報》8号，頁218-220。

97 黃曉蕾，《民國時期語言政策研究》，頁105、114。

參考資料

一、專書

《陳三五娘歌　全四集》（新竹：竹林書局，1986.03）。

中島利郎編，《1930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出版社，2003.03）。

王育德著，呂美親編譯，《漂泊的民族　王育德選集》（台南：台南市文化局，2017.02）。

———著，黃國彥監譯，《台灣話講座》（台北：前衛出版社，2010.04）。

甘為霖，《Ē-mn̂g-im Sin Jī-tián（廈門音新字典）》（台南：台灣教會公報，1913.07）。

田部七郎、蔡章機共著，《台灣土語全書》（台北：[版權請求中]，1896.05[初版：1896.03]）。

安田敏朗，《「國語」の近代史——帝国日本と国語学者たち》（日本東京：中公新書，2007.03）。

吳梅蘭總編輯，《賴和・台灣魂的迴盪　2014彰化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15.03）。

坂口直樹，《戦前同志社の台湾留学生　キリスト教国際主義の源流をたどる》（日本東京：白帝社，2002.05）。

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5・文獻資料選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03）。

京極純一，《植村正久　その人と思想》（日本東京：新教出版社，2008.01）。

周策縱原著，楊默夫編譯，《五四運動史》（台北：龍田出版社，1981.01）。

岩崎敬太郎，《新撰日臺言語集》（台北：新撰日臺言語集發行所，1916.12）。

————，《羅馬字發音式　臺灣語典》（台北：新高堂書店，1922.08）。

東方孝義編，《臺日新辭書》（台北：臺灣警察協會，1931.07）。

林炳炎，《林木順與台灣共產黨的創立》（台北：三民書局，2013.02）。

俣野保和編纂，《臺灣日用土語集（臺灣語集）》（日本東京：民友社，1895.07）。

施正鋒編，《各國語言政策——多元文化與族群平等》（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12）。

施俊州，《台語文學導論》（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12）。
胡適，《白話文學史》（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2）。
飛田良文編，《国語論究第11集　言文一致運動》（日本東京：明治書院，2004.06）。
翁聖峰，《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7.01）。
張漢裕主編，張炎憲總編輯，《蔡培火全集五　台灣語言相關資料》上（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0.12）。
許俊雅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16　張我軍》（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03）。
陳力衛，《和製漢語の形成とその展開》（日本東京：汲古書院，2001.02）。
———，《近代知の翻訳と伝播：漢語を媒介に》（日本東京：三省堂，2019.05）。
———，《漢字文化圏諸言語の近代語彙の形成——創出と共有》（日本大阪：関西大学出版社，2008.10）。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11）。
陳培豊，《日本統治と植民地漢文——台湾における漢文の境界と想像》（日本東京：三元社，2012.08）。
陳培豐，《想像和界限　台灣語言文體的混生》（台北：群學出版公司，2013.07）。
陳翠蓮、川島真、星名宏修主編，《跨域青年學者台灣史研究　第五集》（台北：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2013.08）。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4.02）。
黃曉蕾，《民國時期語言政策研究》（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06）。
楠精一郎，《大政翼賛会に抗した40人　自民党源流の代議士たち》（日本東京：朝日新聞社，2006.07）。
廖瑞銘，《舌尖與筆尖：台灣母語文學的發展》（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10）。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台北市志　卷首下　大事記》（台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9.06）。
劉東方，《“五四”時期胡適的文體理論》（中國山東：齊魯書社，2007.11）。
蔣為文總編輯，《台語白話字文學選集》（五冊）（含：文化論述kap啟蒙、台譯文學、詩・歌、小說・劇本、散文，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11）。
蔣渭水文化基金會，《臺灣文化叢書》復刻版（台北：蔣渭水文化基金會，2011.10；

原《臺灣文化協會會報》第3號，1922.04）。
———，《臺灣之文化》復刻版（台北：蔣渭水文化基金會，2011.10；原《臺灣文化協會會報》第4號，1922.04）。
鄭溪泮著，李勤岸譯註，《出死線》（台南：開朗雜誌事業公司，2009.12）。
蕭阿勤，《重構台灣　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12）。
賴仁聲著，李勤岸譯註，《俺娘ê目屎》（台南：開朗雜誌事業公司，2009.12）。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內國消息　台灣支部〉，《Japana Esperantisto》11卷8期（1916.08），頁11。
山口守，〈北京時期的張我軍：被文化與政治夾擊的主體性〉，《台灣文學研究集刊》20期（2017.02），頁57-106。
王育德，〈中国五大方言の分裂年代の言語年代学的試探〉，《言語研究》38号（1960.09），頁33-105。
市川春樹，〈日治最初期台灣福話教材編纂之相關考察：日本人對台灣福佬話的認知與概念〉，《台灣學誌》8期（2013.10），頁29-58。
田川大吉郎，〈歐米の思潮と羅馬字〉，《臺灣青年》1卷3期（1920.09），頁33-34。
安田敏朗著，呂美親譯，〈日本「國語」的近代〉，《東亞觀念史集刊》3期（2013.03），頁71-117。
林獻堂，〈祝臺灣青年雜誌之發刊〉，《臺灣青年》1卷1期（1920.07）漢文之部，頁2。
金文京，〈陳培豊『日本統治と植民地漢文—台湾における漢文の境界と想像—』〉，《歷史学研究》917号（2014.04），頁54-57。
洪惟仁，〈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語音研究之比較——兼論小川尚義在漢語研究史上應有的地位〉，《台灣史研究》1卷2期（1994.12），頁25-84。
張洪南，〈誤解されたローマ字〉，《臺灣》4卷5期（1923.05），頁48-54。
連溫卿，〈台灣に於けるエスペラント運動年代記〉，《Informo de F.E.S（台灣世界語學會通訊）》1期（1931.12），頁10-13。
陳力衛，〈和製漢語と中国語〉，《比較日本学教育研究センター研究年報》8号（2012.03），頁217-222。

植村正久，〈台灣の青年に望む〉，《臺灣青年》1卷1期（1920.07），頁27-28。

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臺灣》4卷1期（1923.01），頁32。

黃朝琴，〈續漢文改革論　唱設臺灣白話文講習會〉，《臺灣》4年2號（1923.02），頁27。

楊雲萍，〈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回顧〉，《臺灣文化》1卷1期（1946.09），頁10。

劉增銓，〈白話文用語の研究〉，《語苑》28卷5期（1935.11），頁94。

蔡培火，〈新臺湾の建設と羅馬字〉，《臺灣》3卷6期（1922.09），頁45-46。

（二）學位論文

呂美親，〈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湾エスペラント運動研究〉（日本東京：一橋大學言語社會研究科博士論文，2016）。

張安琪，〈日治時期台灣白話漢文的形成與發展〉（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6）。

黃馨儀，〈台湾語表記論と植民地台湾－教会ローマ字と漢字から見る－〉（日本東京：一橋大學言語社會學研究科博士論文，2010）。

（三）研討會論文

張妙娟，〈《台灣教會公報》中林茂生作品之介紹〉，「殖民地教育、日本留學與台灣社會——紀念林茂生先生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日本同志社大學主辦，2002.09.19）。

三、報紙文章

〈上海博覽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722號，1907.06.01，頁1。

〈鑿井瓦斯噴出〉、〈淡水線車遲刻〉，《臺灣日日新報》5281號，1915.03.03，頁6。

施文杞，〈對於臺灣人做的白話文的我見—臺灣人的研究白話文者注意—台灣人的投民報者注意〉，《臺灣民報》2卷4號，1924.03.11，頁8。

張我軍，〈新文學運動的意義〉，《臺灣民報》67號，1925.08.26，頁19-21。

張梗，〈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一），《臺灣民報》2卷17期，1924.09.11，頁15-16。

——，〈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二），《臺灣民報》2卷18期，1924.09.21，頁16。

——，〈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四），《臺灣民報》2卷20期，1924.10.11，頁16。

——，〈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五），《臺灣民報》2卷21期，1924.10.21，頁16。

——，〈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七），《臺灣民報》2卷23期，1924.11.11，頁20。

連溫卿，〈將來之臺灣話〉，《臺灣民報》2卷20期，1924.10.11，頁14。

———，〈將來之臺灣話〉（續前），《臺灣民報》2卷21期，1924.10.21，頁14。

———，〈將來之臺灣話〉（續），《臺灣民報》3卷4期，1925.02.01，頁14-15。

逸民（林耕餘），〈對在臺灣研究白話文的我見〉，《臺灣民報》2卷4期，1924.03.11，頁8-9。

劉捷，〈臺灣文學の史的考察〉（一），《臺灣時報》197號，1936.04.01，頁87。

蔡培火，〈新臺湾の建設と羅馬字〉（一），《臺灣民報》13號，1923.12.11，頁14-16。

———，〈新臺湾の建設と羅馬字〉（二），《臺灣民報》14號，1923.12.21，頁12-14。